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3 年 10 月 30 日第 24 期

本期目录

本刊特稿

何 蜀 志愿者可以为文革研究做些什么

蓦然回首

袁 炯 我看到的唐彼得枪杀解放军事件

史实考订

白 磊 对黄春光口述中一个细节的订正

黄春光 答复白磊的指正

故纸堆

胡庄子 录入提供 站在最前线（长篇小说选载）

李晓航 录入提供 尼克松一行访华期间在京购买我商品情况

庞国义 文革初期重庆的抄家成果展览

文摘

莫小米 凉亭少年杀人事件

陆小宝 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王光照 迎接周总理和外宾来厂视察访问

编读往来

陈益南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何亦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杜钧福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黄肇炎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本刊特稿】

志愿者可以为文革研究做些什么

何 蜀

在今年酷暑（连续高温多日达 40℃ 以上）的一天，一位热心文革研究的 80

后在读博士来访，畅谈中，年轻人谈到一个想法：找一些志愿者来为文革研究做些抢救史料、记录口述之类服务性的工作。这使我深受感动。近年来，志愿者活动已经在一些大型运动会以及环保、救灾、扶贫、帮助抗战老兵回家、帮助被拐儿童寻亲甚至帮助艾滋病人救治等活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能有一些志愿者参加到抢救文革史料方面来，应该是很有意义也会很有成效的事。

那么，志愿者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呢？自从这位年轻朋友提出这个想法以后，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思考，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历史文献方面

有关文革的历史文献，包括文革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文件，各种中央领导人及地方、部门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官方报刊和群众组织报刊中的重要文章，官方及群众组织编印的批判资料、大字报选、大事记，各种人物的检查、交代及申诉材料等等。这方面的文献，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网络版）中已经收进了不少（网络版还随时在增补），为文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不过，相对于十年文革纷纭复杂的历史来说，显然还有不少的遗漏甚至空白。

比如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的第三版（2010年版）中收入的中央文件（包括少量地方、部门文件）：（1966年以前有少部分，略）1966年106件，1967年363件，1968年151件，1969年68件，1970年52件，1971年68件，1972年57件，1973年54件，1974年30件，1975年48件，1976年35件……

光盘中收入的这些文件已经远远超过文革中官方或群众组织编印的各类中央文件汇编，但仍是很不完整的，如1966年的文件，其中所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色海洋”的通知》，发文号是中发〔66〕629号，而收入光盘中的1966年中央文件仅有106件，其中还包括几件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和高教部、北京市委等部门文件，排序为106的1966年最后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还是中发〔67〕2号文件（发文日期是1966年12月31日）。再看1967年的文件，共收入363件，算是文革历年中收得最多的了，排序为363的最后一份文件是《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文件序号是中发〔67〕411号。可见遗漏也不少。当然，中央文件中有的是属于高度机密不向下传达的，文革中也很少有人看到，现在也不可能开放。但是，当时已经公开传达到基层的，仍有不少未能收集到。至于各地区各部门的一些与文革有关的重要文件，现在收集到的就更不够了。

再看光盘中收入的中央首长（包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人）讲话：（1966年以前有少部分，略）1966年563件，1967年1437件，1968年245件，1969年74件，1970年26件，1971年11件，1972年11件，1973年20件，1974年28件，1975年93件，1976年48件……

文革中大量的中央首长讲话是由群众组织记录印发或传抄翻印的。因此收入光盘中的这类资料1967年最多，达到了四位数（1437件），但也仍有不足，比

如当年中央文革碰头会分别解决各省、各地区、各重要部门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时所作的一些讲话，就有许多未能收入；而各地军政领导人的一些重要讲话，如1967年8月28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在四川省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就未能收入，而这个讲话中明确宣布了成都军区给几个专区、县的造反派发枪是请示中央批准的。这个讲话当时在小报和传单上都有（我曾在《昨天》上依据文革资料收藏家和文革研究学者王锐与李晓航分别提供的不同版本的同一讲话转录刊登了一小段内容）。至于1968年底以后的有关资料就更少了，由于群众组织撤销，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不再有群众组织传抄翻印首长讲话这一条件，所以从1969年起这方面的资料数量锐减。但是当时许多人为了能够“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也有的是为维护切身利益而从有关文件里寻找依据，仍然在私下记录传抄一些首长讲话，所以这方面资料保存在民间的仍然有相当数量。

再看光盘第三版中新增的一个栏目“文化大革命的各类大事记”，收入的这方面资料有：1966年9件，1967年42件，1968年7件，1981年1件，1984年1件，1985年2件，1987年2件，1988年2件……

显然，文革大事记所收数量与实际有过的相比差得很多。当年许多单位、许多群众组织以及支左部队都编有各自的大事记，文革之后各地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以及后来由各级党史研究室、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写的大事记（文革时期）就更多了。

光盘第三版中还有个新增的栏目：“文革中的特殊档案：检查、交代、申诉书、请罪书、遗书等”（这一栏目是我受邀编辑的，当然许多资料是永毅兄他们提供和组织录入的），在这一栏目里收入的这类资料有：1965年1件（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1966年44件，1967年115件，1968年36件，1969年23件，1970年24件，1971年7件，1972年21件，1973年12件，1974年8件，1975年15件，1976年7件……

显然，收入光盘的这类资料数量还远远不够（而且其中有些还只是摘要而无全文）。实际上这方面资料应该是很多（甚至可谓“浩若烟海”）的，尽管那些所谓的检查、交代、请罪书中充斥着大量的对照“最高指示”和政治“主旋律”调子给自己扣大帽子的自诬之词，但其中多有涉及一些重大史实的陈述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如已经公开出版的邵燕祥的文革检查交代汇集《人生败笔》，郭小川的《检讨书》，李辉整理的《赵丹自述》中那些“139号犯人狱中报告”等，都有很丰富的研究价值，而真正整理出来的目前还很少，亟待有心人去抢救。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刊物、传单，是研究文革中群众造反运动时期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已经成为民间收藏的一个热点，但是一般的收藏者只将其作为收藏品收集，奇货可居，不轻易示人，使之难以在文革研究中发挥作用。美国华盛顿的中国资料服务中心近年来已经陆续影印出版《新编红卫兵资料》115卷，收入了大量的文革群众组织小报（北京地区接近全部），虽仍有不少空白或

遗漏，但已经非常难得了，只是中国内地的研究者很少能看到。像上海的“陈老头子”陈国康那样把自己收存的文革小报全部无偿捐赠给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建立文革资料库，像现居加拿大的华人何理先生把自己收存的文革小报热心提供给美国的图书馆复制《新编红卫兵资料》，这样的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一定非要拥有资料的原件，只要能有复印件、扫描件或转录的电子文本，能看清文字就行。因此，志愿者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不小的作用，除了搜集寻找当年资料外，还可以将能够看到或借阅到的当年资料中一些重要篇章转录成电子文本提供给研究者。如果一个志愿者提供一份资料的电子文本，100个志愿者就可以提供100份，集腋成裘，其数量就相当可观了。

二、个人资料方面

人类历史是由人物的活动构成的。司马迁写《史记》就是以人物为主，从帝王将相到儒林、酷吏、游侠、滑稽……通过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来多侧面地再现历史。而这一优秀的传统在当代历史写作中却很少看到了，常常是见事不见人，即使写人也只写“帝王将相”（领袖将帅）而绝不会见到“儒林、酷吏、游侠、滑稽”之类人物的身影。要加强对文革人物的研究，就应该注意收集文革中各类人物的资料。在这方面，志愿者可以做的事很多，比如：

1、记录整理亲历者的口述。这些亲历者大多年事已高，疾病缠身，而且许多不会使用电脑，因此志愿者帮忙用电脑录下其口述，整理成文，很有必要。口述内容可以是个人简历特别是文革中的经历，也可以是对文革中某一重大事件的亲历见闻，也可以是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受指控的某一罪名的澄清、申辩等等。不拘一格，并最好能将整理好的口述文字再交口述者审定，修改补充。此外，如果亲历者自己能写也愿意写，志愿者也可以帮忙整理录入电脑。近年来，口述历史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我不赞成把口述绝对化，似乎口述就一定比手写的更有价值，甚至让一些明明有文字写作能力和条件的人也做口述，这就有点过分注重形式了。其实，只要能抢救和保存下一些历史真相的片断记忆，不管是口述还是笔述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记录下来，抢救下来。

2、收集文革中风云人物的资料。如当年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军人、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中共“九大”、“十大”和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骨干成员，当年群众报刊的编辑、主笔和一些重要文章的作者，当年与一些重大事件有关的人员，当年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涉案人员以及被打成“黑手”的干部等等，搜集他们的个人简历、照片及相关资料（如当年的署名文章，点名批判文章，检查交代、认罪书、判决书、申诉书、遗书、平反通知书、平反公告等等）。

3、收集文革中不同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的资料。如工作组时期迫害致死者，“红八月”中受害致死者，派性武斗致死者，暴力屠杀致死者，“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致死者，“揭批查”运动致死者等等。通过亲历者口述或采访调查，记录下这些非正常死亡者的姓名、身份、年龄、死亡时间和原因等等，能收集到生前遗像当然更好。不必求全，了解到一个记录一个。

志愿者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要加强信息交流，比如，对准备转录的某一资料，先应了解清楚在网上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或光盘中是否已经有了，以免做重复劳动。

许多亲历者正在故去，许多鲜活的记忆正在消失，许多史料正在湮灭。对文革史料和记忆的抢救，与抢救被破坏的自然环境，抢救遭灾遇险的难民，抢救被骗被拐的妇女儿童……一样，都是抢救性和服务性的公益事业。志愿者在这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013 年 10 月 6 日于重庆风江阁

【蓦然回首】

我看到的唐彼得枪杀解放军事件

袁 炯

我退休近十年来，经常回忆往事，特别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那场十年浩劫，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我一直关心一个人的命运：成都工学院的一个老师，他就是唐彼得。我经常在网上搜索有关唐彼得的消息，我也向在成都的很多朋友打听，因为年代久远，都不知道了。

就在我抱什么希望的时候，一天我用“工学院”、“唐彼得”两个关键词，在“永远的成都科技大学——浣花社区»校园往事»[维基百科]成都工学院（附贴：逸闻佚事）上，搜索到了——

“工院人”的帖子（第四页 60 楼）：

唐彼得：原工学院电机系青年教师。文革中，红成“十·一”战团成员。1969 年因“毁我长城……枪打解放军”等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记得是 1968 年初春的一个上午，全院正在原电影广场组织听传达中央文件，突然从广播里传来了紧急的喊话：“8·26 武装人员经侧门、从北大门进攻我们了……”当时一片混乱，自卫人员立即奔赴校大门，其中就有唐彼得。听跑在前面的同学讲，当时有几辆载有身着军绿色服装的武装人员，正从九眼桥方向沿一路朝我大校门驶来，联系广播里的那一喊和前几天 8·26 将我一印刷厂工人师傅（当时正在校内行走）击毙的新仇旧恨，都以为是 8·26 要大举进攻我们了，有人就开枪了，其中唐击中一名人员。殊不知情报有误，这几车不是 8·26 的武装人员，而是警备司令部的军人。这可闯大祸了！被打到的军人经抢救无效而亡。当时，着军绿色是一种时尚，伪装解放军（特别是各派的武装人员）也不少见。那么，如果唐明明知道是解放军，还故意开枪吗？我无从所知。

1969 年下半年，我们已分配在 13 军的某连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好久了。一天，在广安县一个镇的街头，我见到了以省革委名义发布的唐彼得等人被执行枪决的公告。我不知，当时省革委里的“两挺”、还有“江政委”等等是如何主持判定的（那时“公、检、法”还未恢复职能）……

唐肯定犯下了大错特错，但当时的省革委如果法制性再强一点，唐也许不会被立即执行吧？！今年，是唐用血肉之躯为那场纷争埋单的整整 40 年，可谓人世沧桑。

（以此文字，为将来写工学院正史、野史或传记的人们一点参考，没有别意）

（第五页 63 楼）：附带再说一句：唐彼得（曾是优秀共青团员）出事后，工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几位头面人物，曾出面以误伤为由向警司担保。但后来由于伤者未能抢救过来及工宣队进校后加上自身难保的窘状，其命运可想而知了。不过，历史好像给两派都开了个玩笑？一派的唐被执行了死刑；几年后，另派几乎掌握唐生杀大权的“两挺”及“江政委”等人却被清除出权力阵营、开除党籍。我十分迷惑，造反派中的哪派赢了？？

唐彼得打死了一个解放军，我刚好在现场，目睹了事件的全部经过，事实与上述帖子有不同。唐彼得是犯了罪，但罪不至死！

1968 年初的一天，应该还是冬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到成都工学院找在机械系 67 级读书的一个高中同学（我们在成都四中高中是同班，他叫杨祖成）聊天，快吃午饭了，我离开了他的寝室，准备回四川医学院我们重庆大学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的住地，川医解剖楼。

走在工院校内，没有听到什么广播，也没有看到校内的行人有什么慌乱，感觉一切正常。刚走到工学院大门口，看到一些人正在准备设置路障，好像要封锁大门前的公路。公路不宽，仅双向两车道，路的两边都有绿化树，有不少的行人。

路障还没有设好，一辆吉普车从九眼桥方向（即大门的右面）高速开过来，在我右前方不到两米的地方，有一个人企图拦车，吉普车未加理会，冲过来、扬长而去。就在吉普车经过那个人跟前后，他就开始拔枪，拔出手枪后，对准吉普车离去的方向，“砰”、“砰”连打两枪。公路不是直的，而是经过工学院大门以后有一个向四川医学院方向的弧形大弯。打没有打中吉普车我不知道，汽车绝尘而去，很快不见了踪影。

就在这时，弯道处有人大喊：“打到人了！打到解放军了！”我往前一看，大约在 100 多米的地方，果然有一个穿军装的人倒在了地上。我愤怒极了，如果我有枪，我很可能一枪打死这个拦车开枪的家伙！我大声对他说：“你疯啦！？路上这么多人你竟敢开枪！”我立即叫开枪的人与我（还有别的一些人）一道向被枪击、已经倒地的人跑去。到跟前一看，果然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头部中枪！还有一个战士正扶住中枪的战友不知所措地哭着。我立即叫旁边的人叫救护车。我一直看住开枪的人，不让他离开。不一会救护车来了，围观的群众齐心合力地把受伤的解放军抬上了救护车，伤者的战友跟车去了。

看着救护车开走，我心里在想，怎么处理这个开枪的人。场面这么混乱，我唯一想到的是，把他送回他们学校，由他们学校去处理吧！我叫他回学校，他也很配合，他知道他已经闯下了大祸，面无血色，一声不吭地跟着我。

我不知道工学院掌权的一派具体叫什么名称，只知道是属“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派，在四川省，当时与我们重大八一五是一派的。在回工学院红卫兵总部的路上，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在校门前的公路上拦车？他告诉我，有消息说四川大学八二六的武装人员要经过我们学校大门前的公路，我们想抓住他们。我俩没有更多的交谈，我甚至没有问过他的名字。但我能看出来，他比我年纪大一些，他是一个教师，武斗队的一个头头。

由他带路，到了他们的总部。总部在什么楼，在几楼，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总部好像只有一两个人，我把他带到他们跟前，对他们说：“他在大门口打死了一个解放军（我的第一感觉解放军已经是死了），具体情况他跟你们说吧，我是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的，我叫袁炯，希望你们正确处理，人我就交给你们了。”说完，我没有再逗留，离开工学院回川医了。

回到川医我们的驻地，我立即报告了我们头头，要他直接跟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头头通气，不要让工学院的包庇那个人。当晚我回家睡了。我家住在下草市街。

第二天我上街一看，吓坏我了！街上到处都贴满了大标语：“严惩打死解放军的阶级敌人唐彼得！”另外还有大字报和传单，内容还涉及到了我，说唐彼得在打死解放军后被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包庇放走了。

这时，我才知道开枪的人叫唐彼得。

当天，唐彼得为什么要听我的话跟我走？我带走他，为什么没有人敢阻拦？我事后分析是，当天我穿了一身正规的军装，外面还穿了件军大衣，都是干部装，还戴了军帽，仅仅是没有帽徽和领章。那个年头时兴穿军装。军装都是我在部队当干部的哥哥和姐姐给我的。唐彼得和其他人一定都把我当成解放军干部了。

我哪里会包庇唐彼得！我哥哥、姐姐都是解放军，在那时，我对解放军有特殊的感情，我从小就想当解放军！1962年初，我在成都四中读高三，部队到我们学校征兵。我们班有三个同学先后入伍了，我也一心想去，功课都丢了，到处找领导要求。最后我和另外一个同样也想当兵的同学竟然到成都军区找司令员。那个年代，当官的没有一点架子，一个姓韦的副司令员还真的接见了我们，要我们回学校安心学习，服从国家的安排。

看到街上的大字报，我真吓坏了，害怕了，我们家那一带是八二六控制的区域，万一给人认出来，我就麻烦了！第二天我就赶紧离开成都回到重庆。

此后，我一直关心会怎么处理唐彼得。在我眼里，他确实犯了罪，应该受到惩罚。我当时非常气愤，把他交给工学院处理，是我唯一能想到的。那个年代，公检法都被砸烂了，瘫痪了，也分成两派在打“内战”。现在回想，我还是觉得我的处理没有错。

当我看到“工院人”的帖子时，开始是大感意外！怎么要处以死刑，立即执行？不至于啊！他不是有意的！我看到的事实是：

第一，被枪击致死的解放军不是吉普车上的，而是走在公路边的众多路人之一。而唐彼得是朝着吉普车开枪的。

第二，唐彼得不是故意的，他在开枪的那一瞬间，根本没有意识到会伤及路

人。

第三，我告诉了他们我的单位和姓名，我可以证明他不是有意的。

的确，他的无知和一时冲动，夺去了他人的生命，他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对比重庆文革武斗中大量枪毙对立派俘虏的众多恶性事件，唐彼得比那些人的情节轻多了。那些人都很少被处死刑的，大多是判十多二十年。

为什么要判他的死刑？唐彼得是1969年处理的，省革委里的刘结挺、张西挺是八二六派的后台，他们哪里会讲法制，对立派红成的唐彼得不可能有活命的机会。

【史实考订】

对黄春光口述中一个细节的订正

白 磊

不久前，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出版了米鹤都先生编撰的“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之三《难得本色任天然》和之四《光环与阴影》两本文革口述历史，为“共和国第三代”（作者语）的心路历程做了较为完整的记录整理。《光环与阴影》一书收录了黄春光、胡生、金靖宇、李卫平及柯马凯（Michale Crook）五人不同的人生历程和历史记忆，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性与无可辩驳的独特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在这部书中，也有部分史实上的错误与瑕疵，为避免以讹传讹，应该指出来，与编者共同探讨，并请知情人和历史学者指正。

黄春光先生在其口述回忆《光环与阴影》一文中，出现的最大的史实错误，在该书的第52页至53页，其原文如下：

“1968年3月，我父亲刚到北京当总参谋长不久，就赶上陕西省要成立革委会。我记得，一天下午，父亲从中央文革碰头会回来说：你不是和李瑞山和胡炜很熟吗？我说：是啊。他说：你先找胡炜说一声，主任不是他了，要换成李瑞山，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并叮嘱我：不要说是我让你去说的。我说：他要问原因呢？父亲说：中央定的事情。原来内定的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是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名单报上去的也是他，结果突然换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在西路军时曾被俘过。那天晚上开会要宣布主任、副主任名单了，父亲处于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他自己出面说又不太合适，就让我提前给他们打招呼。像这样的事，不少都让我去办的。”

黄春光的这段口述，有很大的硬伤。胡炜，原名胡守德，河南新蔡人，1920年生，1933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中学，1936年考入省立开封高中，在开封读书时，积极投入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声援“一二·九”运动的游行与卧轨请愿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共开封党组织介绍，1937年参加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1938年入党。历任新四军四支队八团政治处干事、连指导员、五支

队团政治处组织股长、营政治教导员、第十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四团政委、四旅十团政委……从胡炜的简历来看，胡炜属于抗战时期的干部而并非红军时期干部，根本没有参加西路军的记录，更不可能有“在西路军时曾被俘过”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请教了一些二十一军在陕的老同志，他们也肯定胡炜并未参加过西路军，更不可能有被俘的说法。

至于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人选，从各种现有的资料来看，李瑞山是被中央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领导干部，而未闻所谓“内定胡炜”之说。陕西省革委会成立前，支左委员会曾邀请以西安交大、工总司为首的“东派”，和以西军电、西工大、工联为首的“西派”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六十余人开会，协商成立陕西省和西安市革委会的方案。根据中央关于成立省革委会的原则指示，参照已建立省革委会的人员组成情况，经过反复协商、研究，确定陕西省革委会由149名委员组成，并设常委35名，正副主任8名，而陕西省革委会主任则由中央确定。在胡炜的回忆文集《征程纪事续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中《周总理对陕西的关怀》一文中有回忆：“经党中央批准，陕西组成了由军代表、领导干部和群众干部参加的汇报团40余人，于（1968年）4月上旬抵京，总理接见了原省委第二书记李瑞山同志、黄经耀同志和我。总理指示说：看了你们的报告，中央认为陕西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可以适时的成立革委会。中央决定由李瑞山同志任革委会主任，军队同志要支持他的工作。霍士廉同志目前以不参加结合为好，军队领导同志也不宜长期担任地方领导工作。我和黄立即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胡炜的回忆也佐证了当时中央对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人选是李瑞山这一说法。

1968年5月4日《人民交大》刊载的《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陕西省赴京代表团的指示记录》，详细记载了4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及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陕西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在这个讲话记录中，周恩来在谈到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人选时讲到：“这次为什么没有让军队的同志做主任，而让李瑞山同志做主任，就是因为军队任务重……二十一军是野战军，分布三个省，陕、甘、宁都有，需要照顾部队部分工作。有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虽然能力弱一点，不够理想，理想不是化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步锻炼出来的。要考虑，这样提出来有好处，对李瑞山也是个警惕。胡炜、黄经耀、杨焕民与革命群众代表结合在一起，集体商量，研究问题，按照民主集中制，民主商量。陕西工作是康老建议的，通过协商方式把大家搞在一起，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你们那省中央考虑李瑞山同志任主任，有的同志说不够理想，理想是相对的，就是强的，也有弱点，容易产生一言堂。”

由此可见，陕西省革委会主任的人选，是周恩来与康生商讨定夺的，而康生则是分管西北文革的中央领导。我就这个问题也电话请教过原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西安交大的红卫兵领袖李世英，他说在讨论陕西省革委会人员名单时，两派争论的人选只有霍士廉，是否结合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进入省革委会，两派观点不同，而并无争论过胡炜或李瑞山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的问题，至于革委会

主任由军队干部来担任，还是地方干部来担任，李世英说，我们遵照中央指示，所以并未讨论或争辩这个问题。

黄春光的“内定胡炜担任革委会主任”之说还有一大漏洞，就是当时各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甚至常委名单，乃至常委结合比例，都主要由周恩来决定，黄永胜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众所周知，黄永胜是1968年3月下旬“杨余傅事件”之后，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从广州调进北京的。在革委会成员名单的讨论中，他作为从广州军区提到总参的四野出身的领导干部，怎么可能为与其无甚关系的三野出身的胡炜是否担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而牵挂操心？甚至违反党的高级干部保密纪律，让儿子黄春光带话给胡炜呢？在当年的中共高干中，很多高级干部保密意识很强，极少让子女知道自己工作中的事情，更不会在饭桌上讨论与工作有关的话题。以周恩来为例，周恩来办公室的钥匙共有三把，自己一把，值班室一把，秘书一把，包括其夫人邓颖超都没有钥匙，更不能随便进入周的办公室。而黄永胜怎么可能刚到中央，在自己无甚发言权的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人选的事情上，让自己的儿子带话给陕西的一二把手李瑞山、胡炜呢，黄永胜这样做，不怕被康生知道，认为黄伸手越权吗？

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和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史并不是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人说，一人记的文字记录，而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即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与文字档案对照核实，整理成文的史学成果。在记录整理中，对有关史实与其他历史文献作比对，让历史更加全面、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真实，是十分重要的。

2013年9月草就于西安

【史实考订】

答复白磊的指正

黄春光

感谢白磊先生指出文中硬伤。胡炜是抗战干部而非红军，当然也就没有“西路军被俘”一事了，审稿时我也疏忽了，再版时会改之。但胡炜的确因历史上有点什么问题而被临时换掉，而未能入陕西革委会主任一职。

当时，各省革委会成立的程序一般都是：待条件基本成熟，特别是两派群众组织的意见基本无大矛盾，由各省军管会或筹备小组或核心小组向中央报名单，其中主任、副主任、常委都是定下来三结合的干部。这个名单要在中央和省之间反复研究多次（电报），基本定下来后，会让他们组团来京。由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碰头会）成员和他们开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弥合两派分歧，意见同意后，由各省正式向中央报告。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碰头会）集体研究后，写好

批复报毛、林。毛、林同意圈阅后，以中央批复，下发中央文件，各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才正式生效。我认为在中央文件未批复下发前，就可算内定。

陕西省多次上报中央的请示文件都是胡炜为革委会主任，最后上报中央的也是胡任革委会主任，这在省、中央档案馆中应可查到（如未被清理销毁的话）。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碰头会）最后研究的会上（按白文应是1968年4月30日下午）康生提出胡炜历史上有问题，需审查清楚，不宜任革委会主任，临时决定李瑞山任主任，才有我父亲开会后回到京西宾馆，让我向胡炜、李瑞山（我口述是有，出版时不知为何删了李，也可能是漏了）先后打招呼的事。此事我记忆清楚，就是当天在京西宾馆我去告诉的胡、李，连胡炜当时的表情还记得。这是不是周恩来和我父亲有商量，我不得而知，但我父亲让我去打招呼是确有此事。这也说明为什么有周恩来当晚的一席话，如果不是临时换将，周有必要做那么大一段的解释吗？如早定李瑞山为主任，周根本没有必要讲这个话。胡炜回忆录中不说，可能因为这对他说来说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

但愿我说清楚了此事。再次谢谢白磊先生！

2013年9月9日

【故纸堆】

站在最前线

（长篇小说选载）

胡庄子 录入、提供

说明：1967年9月，首都红卫兵《准备》编辑部所办刊物《准备》第1期，在头条位置刊登了长篇小说《站在最前线》（选载）。关于《准备》这本杂志和长篇小说《站在最前线》，目前没有见到专门的回忆文章。仅见到学者杨健在《中国知青文学史》中的一段介绍：

“《准备》杂志在1967年夏创刊，编辑部人员是国防科委20基地的干部子弟和北京5中、101中、师院、北大附中红旗的部分老红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中学老兵组织的负责人和笔杆子。他们认为中央文革拉一派打一派，耍政治手段，决心用文艺作武器，找些古诗，写点小说来反中央文革，替‘联动’翻案。当时他们分析，康生是支持‘联动’的，于是制定一个策略：拉康生打陈伯达。于是策划创作了小说《序幕》。《序幕》标以‘长篇小说选载’，仅发表了‘第一章’。小说描写：在钓鱼台宽敞的大办公室，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他在等待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双疲倦带血丝的眼睛，苍白的两鬓。红色电话机的铃响了，他拿起电话：‘我是康生！’……他放下电话，低声自语道：‘终于打响了！’这本进行政治斗争的杂志，为16开本，发表攻击中央文革的诗歌、小说和杂文，第一期印了1000册，由于无法收回成本，只出版了两期就停

刊了。”

这段话，一、告诉我们创办《准备》杂志的是些什么人，以及办这本刊物的目的。二、其中所说的《序幕》，应该就是《站在最前线》，《准备》上刊登的可能是《站在最前线》的“序幕”部分。三、《中国知青文学史》的作者杨健，并没有见到过《准备》这本杂志，他所说的“小说《序幕》”、“第一章”，刊物上并没有这样的字样，他这样说，可能是采访得来的二手消息。小说中，康生接毛泽东电话的情节，是一个重要的情节，并不全是虚构的。康生1966年8月4日在北大讲话中说：“……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一看到大字报，马上采取措施，立刻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刻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并且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六月一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当时我和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我们也受到压力。晚上八点广播，一广播，整个北京都炸了。”这段话见之于新北大学习最高指示战斗小组1966年11月编印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负责同志重要讲话（1966年6月—1966年10月）》第16页。这段话对于理解小说的创作有帮助。

他低着头，倒剪着双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他右手的食指不停地弹着一支香烟，烟灰已经被这无意的，重复多次的动作弹得干干净净，露出了暗红色的烟头。他的脚步缓慢地、沉着地移动着，不时在转弯的时候站立一会，再踱开去。绣着朴素花案的地毯在他脚下沙沙作响，房间里的空气随着脚步微微在动荡。

走了几个来回，他站住了，在那张挂在墙上的大幅蓝灰色的世界地图前面站住了。连日来紧张的会议使他那刚毅的脸变得更加削瘦，脸上过分严肃的神情已略微退去，显得很平静。但是这种平静的神色往往被那些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人用来作为他们内心过度紧张的一种努力掩饰，是为了更冷静地去思索那些并不平静而且是异常激烈的现实斗争。他的嘴紧闭着，嘴角的线条显得很有力。这样的表情真是那样确切地刻画着信念和力量的形象。

他抬眼向地图望去，让眼里充满那种轻心的蓝灰色，借此让自己紧张的思想松弛一下。但思维的惯力不能使他马上平静下来，盯着地图的目光刚刚缓和一下又变得只是在思想高度集中时才有的那种深沉，而且渐渐深沉到仿佛不是在看地图，而是透过地图看见了，看见了那巨大的，蔚蓝色的，缓慢旋转着的整个地球。他默默地注视着从眼前掠过的著名的山脉和河流。

哦，这是塞纳河，这条河里曾经流淌过巴黎公社社员们的热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是多瑙河，她曾经冲去布达佩斯两岸纳吉集团的腐尸和反叛的硝烟。可是那有什么用呢？

这是多瑙河上另一个首都贝尔格莱德，“现代修正主义”这个名词大概就起源在这里。

他的眼前掠过万水千山，终于那个拥有两千万平方公里疆土的苏联展现在他眼前。那熟悉的伏尔加河，乌拉尔山和辽阔的西伯利亚平原，看上去这样的令人

痛楚。他微微侧转头，仿佛去搜寻阿芙洛尔号巡洋舰炮声的回响，但是什么也没有。十几年来的变化就是这样无声无息的，但确是那样惊人。

他不愿让目光在这片土地上多停留一会儿，而急切地转去，久久地落在那亲热的，熟悉的，散发出温暖气息的祖国大地上。

为了策划一个战役，战略家们大概要几天几夜伏在地图上。但是到决战的前夜，他们最后一次俯视地图的时候，大概就不是再去思索军队应该怎样运行，战线应该怎样推进，敌人可能向哪个方向逃窜，因为这些早在几天前就计划好了。而应当慢慢地点燃一支烟，让目光轻轻抚过那山川、河流、应该幸福地遐想一会儿。在激战前，他们会对这片土地产生多么深情的爱哟，虽然这可能是一片荒山野岭，但是他们想得很远，一直想到战后，哪里可以修个水库，哪里可以开成梯田，哪里可以修公路，哪里可以建设新村，甚至都想到房屋前后还可以种上十几棵大叶烟。首长们互相开个玩笑会勾引起他们对家乡亲切的怀念：要用战争解放她。

现在他站在地图前，盯着祖国的身影，就像那战争年代一样，虽然残酷的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但他仍能抽出一点时间远远地遐想。

“是啊，这样多娇的江山，经过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会变成什么样呢？”

刚刚解放十七年，十七年啊十七年，这在历史的尺度上是那么短暂，那么渺小，然而这十七年却有那样深刻、那样长远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它孕育着一个伟大理想的到来。在奔向那个伟大理想的大道上，原来有着苏联、波兰、匈牙利、德国等十几个兄弟国家，但是，突然他们倒退了回去，背离了这条路。一个十分重大以至马克思、列宁都没有系统预料到的问题摆在我们前面，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还有没有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的焦点还是不是政权问题。我们伟大的毛泽东同志，我们的主席最先觉察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通过自己的判断，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大胆地创造性地、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并以惊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魄力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对，对，对！即使全黑了，只要中国不变颜色，世界就有希望。

没能允许他再往下遐想，现实斗争又把他拉了回来，他好像大梦初醒一样眨了眨眼，掏出手帕擦了擦角质的眼镜，离开了地图，又朝房间深处踱去。

阳光穿过宽大的玻璃窗射进这间办公室，射在办公桌上，射在那部放在桌子正中的，打开着的，为老年人准备的一种线装毛选上。毛选的中缝放着一枝红蓝铅笔。书旁的烟灰缸里，几支还没有熄灭的烟蒂，冒着一股股细细的清烟，由于主人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那带有尼古丁滤头的香烟，所以整个房间都充满着这种淡蓝色的烟雾。偶而一阵风吹进来，微微吹散一些烟雾，也吹动了桌子上的日历，那印着数字的活页一翻动，醒目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窗外传来白杨在微风中发出的哗哗声，但这些声响并没有破坏房里的气氛，它反而使得房间里显得更加宁静和肃穆，只是主人来回的踱步，和他那透过角镜射出的略带焦虑的沉思着的目光，使得这宁静的空气隐隐约约的显得有些紧张。

“这十几天，党内斗争已经严重到了白热化，五月十六日主席发出通知，一下子打乱了彭真那一伙子的阵脚，撤消了他们的工作，成立了新的文革小组，党内的矛盾算公开了。这样重大的变动，群众中一定会引起反响，在这动乱中，有什么东西值得抓住，成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力量呢？”

突然，放在桌子右角的那部红色电话急剧地响起来，“嘟……”的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他猛然地站住，脸上露出久待已到的神色，他大步跨过去，绕过桌子的时候被地毯的一角绊了一下，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迅速地抓起电话，并抬手看了一下手表，这是下午四点正。

在他抓起话筒的一刹那，他感觉到什么了呢？

他仿佛已经获得了解决所有矛盾的方法，他仿佛已经获得了克服所有困难的力量。这样的情形有多少次啊！只要他一听见那熟悉的、豪迈的、有力的声音，他就突然增强了信心和智慧。以至到以后，他一拿起这部电话，就有了这样的感觉。因为，这是通往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啊！“哎，我是康生……”他操着山东口音回答。

电话中响起了主席那亲切的声音。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一场震撼世界的大革命，伴随着电话中传来的声音，即将来临了。

……

晚上八点钟，天突然阴下来，浓密的乌云遮住了星星，沉重地笼罩着古老的北京城。不一会，雨倾注下来，而且越下越大，风把满天的雨柱吹得歪歪斜斜，但是这些怎么能压住北京大学的沸腾！

人们顶着雨，像决堤的怒潮，涌进了北大。北大校园里，像在每一次大革命刚刚爆发时的那种情况一样，显出异常的纷乱。人群，像是沸腾了的水，来来往往，忽而涌向这边，忽而又涌向另一边。标语，红旗，在风雨中忽啦啦地卷着，和嘈杂的人声搅成一片。

校园的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传出春雷般的震撼人心的声音，那愤怒的质问：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

多么欲碎欲裂的雨夜啊！楼房，在风雨中摇撼；风雨，在大地上抖擞；大地，在呐喊中微微颤动。

北大的同学在迎接着风雨中的战友，他不时拂去脸上的雨水和夺眶而出的热泪，无数只温暖的手接连不断地向他伸来，无数声“我们支持你们”的话语在四周起伏。这是多么扬眉吐气的一夜啊。突然，一条鲜红的，夹着一张字条的窄窄的臂章跃进他的怀里。他没有看清这是谁给他的，没有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看见一个穿着褪色军装的背影，只隐隐约约听见一句：“这是代表红卫兵献给你们的，红卫兵支持你们！”

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

在这场面外，有一个人，他打着伞冷冷地望着人群，面色被雨天的阴影遮住了，他看看人群，看看大字报；瞧瞧大字报，又瞧瞧人群。突然他身边急剧地响起车铃声，他微微一惊，车灯照亮他那尖尖的脸。他的身边掠过那个穿军装的身

影，眼前闪过那小伙儿兴奋的，高扬起的双眉，和那含有某种渴望的目光，小伙子像一只黑色的海燕，飞快地掠过翻滚的大海，他身后仿佛响起“暴风雨啊”的欢呼声，但，风却把这喊声劫去，只有云中的雷声似乎在隐隐回答。

六月一日的夜晚，太空中交织着风雨，又交织着稠密的电波，各国通讯社在紧张的收听着，捕捉那太空中的信号。电波把六月一日的北京、六月一日的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带到世界各国，各个国家的政治家们在震惊地、惧怕地分析中国的风暴，这风暴象征着什么呢？是死亡还是希望？

.....

一个伟大的战略步骤就这样开始了。康生同志站在窗前，风雨敲打着窗子，外面漆黑一片，已望不见玉渊潭的湖水和军事博物馆尖塔顶上的红星。在这激战开始的一刹那，他的思想该有多么丰富啊，但是他只是默默地念着三个简单的字眼：“打响了。”

打响了、打响了，这在军事家们的心里该是多么熟悉和渴望啊！战前一刻他们俯在地图上，焦急地望着手表，在等待着，等待着那一声巨响。决定性的时刻到了，当从那遥远的战上传来震动大地的炮声的时刻，指挥员们兴奋地抬起头，互相望着，有多少话要说啊，但他们的心里所共有的只是这三个简单的字眼：打响了。

战役打响了。群众中还会出现什么，要依靠什么力量把战斗展开？谁可以做先锋队呢？在中央怎样进行斗争？怎样解决一些同志的思想问题，使他们更主动些呢？一堆问题又涌出了他的脑海，他决定再研究一遍5·16通知。他把窗帘拉上，转过身，突然，他注目地看着对面墙上放大的毛主席的手迹，那豪迈的诗句。这诗句在平常多么熟悉，但今天，他是这样的有感触，那气势磅礴的字体描绘出一幅无比雄浑悲壮的图画：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未完待续)

原载《准备》第一期

【故纸堆】

尼克松一行访华期间在京购买我商品情况

李晓航 录入、提供

说明：此件原系钢笔手抄件，未署名，也未署日期，只在文末括号中注明“外贸部办事组调研室根据友谊公司和民族饭店提供资料整理”。从文中所述“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在友谊商店问我翻译人员：‘我还能得到一次机会来买货吗？’”可知，让这些美国人在指定商店购物是有关方面安排的专场“特供”。本文转录时对原文中明显的错字作了订正，如“选遣机组人员”更正为“先遣机组人员”，“兰色”更正为“蓝色”，“故虑”更正为“顾虑”，“正理”更正为“整理”等。

美国代表团成员，在京期间先后在下列商店购货总额 11 万余元（人民币，下同），即：在友谊商店购买商品 2.13 万余元，在珠宝商店购货 8.64 万余元，在民族饭店购买商品 4300 多元。

美国代表团人员选购了许多毛主席像章，总数为 2331 枚，其中罗杰斯一次在友谊商店就购像章 70 枚，他们还买了 77 张伟人像，还有人买去精装《毛泽东选集》14 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两册。尼克松在京期间未到过商店，但由别人为他代购了一些礼品，如石刻象（规格是六公分高、九公分长）买了几百只（据称象是“象征和平”的意思，又是美国共和党的标志）。还买了漆盒、景泰蓝、盖杯和筷子等，共约 5000 元的东西。尼克松夫人到商店看了些高档商品，很感兴趣，但购买不多，在友谊商店买了 36 米丝绸。罗杰斯两次到商店，共购货 4000 多元，其中买了一只翡翠戒指，价值 3000 元。他曾表示，他最喜欢北京的工艺品。此外，美国代表团成员、记者、先遣人员和机组人员均到我商店普遍购货，自二月四日到二十九日先后共有 755 人次，分 133 批到友谊公司选购商品。

从他们购买的商品情况看，涉及的商品品种比较广泛，有丝绸、工艺品、小百货、小五金之类，大到地毯、雕花的樟木箱，小到顶针、扣子和清凉油，购买商品范围达 180 多种。这些反映他们对我商品普遍喜好。基辛格的女秘书到商店次数比较多，主要为别人购买了许多商品，她曾表示：“你们的商品都很好，不知该买什么东西好。”甚至一些美国人对商店柜台上摆的珠算盘也有兴趣，表示想买。

这次，他们真正买个人用品不多，大部分是买些物美价廉、有纪念性的、便于携带的商品，尤其是对我传统商品，如富有民族特色的丝绸、丝绸头巾、各种精巧的手工艺品、瓷器、珠宝钻翡、丝绸风景、石刻、木刻、民族娃娃等，表示很大的兴趣。美国代表团中许多人购买了我针灸品，表示对我针灸学感兴趣。从实际接触中，他们对我各类商品有如下的一些反映：

迫切想买我国的丝绸

美国人普遍询购我真丝织锦，不管品种如何，只要是真丝的就想买。但由于我货色不全、数量有限，开始未出售，只是最后为了照顾尼克松夫人，专门对她卖了一次，拿出十来种花色，她选购了六种花色，共买了 36 米。罗杰斯的女秘书皮诺小姐购买了 50 多米丝绸，其中有真丝的，也有交织织锦。在美国代表团抵京前，先遣机组人员购买了一些带中国风味的人造丝风景缎，真丝买的不多。总之，从他们对我丝绸的喜好看，首先是真丝的，其次是交织的，再次是人造丝绸。从选购的花色看，他们喜欢浅色素静的，例如湖色和正绿色（浅蓝色），尤爱浅蓝，很重色不喜欢，花形爱桃梅花、竹叶和菊花。

美国人对我丝绸头巾普遍欢迎，一般到商店都不例外的买一些，他们共买了 369 条头巾，花色上，他们喜欢颜色上鲜艳一点的，特别对我杭州出产的头巾很

感兴趣，这种头巾上印有“完全真丝”、“手工织绣”字样的商品，据说美国人最欣赏这两个标志。此外，丝绸手帕也受到美国人的普遍欢迎。

对我工艺品最感兴趣

这次美国人购买我工艺品，比较突出的是下列一些品种：

丝织风景和刺绣

对我丝织风景，争相选购，他们在友谊商店一处就买了 591 条，还在民族饭店购买了 913 块丝织织品，其中以山水、花卉和名胜古迹（如颐和园、长城）的风景最受欢迎，这类商品富有我民族特色，物美价廉，便于携带，最适宜做纪念品。有的表示回去后要送给朋友，刺绣买了 63 种，美国人喜欢小猫、绣老虎、绣熊猫的。

竹帘画

美国人喜欢我竹帘画，在友谊商店和民族饭店共买 262 件，其中大部分是风景画，动物画买的不多，但很喜欢老虎为题材的画。

瓷器

我国新的瓷器都比较受欢迎，包括酒杯。尼克松夫妇及其他美国人都买了些。从反映看，最喜欢青花玲珑和青花梧桐的品种，对景德镇和醴陵的产品比唐山的受欢迎。

珠宝钻翠

美国人很想往我国的古老的玉器和首饰，罗杰斯到珠宝商店时，曾要求我售货员给他代表中国工艺品的东西。有一个美国电视评论员专门到我珠宝商店采访，在一次电视节目中，特殊安排我贵重首饰，向世界进行传播。尼克松夫人看了一个价值 8 万元的翡翠戒指，非常高兴。罗杰斯买了一件 3000 元的翡翠戒指，还有翡翠、象牙雕刻等。查平买了一只广东制作的象牙船，价值 350 元。詹金斯买了一对 150 元的耳环。他们还买了些秀石玉人、玉鸟。总的看，美国人此行选购的是中、低档商品，如一些珠钻小件、玉葡萄、玉果子、象牙小勺等，不少人都是一包一包的买，美国人对我美观、牢固、大方的首饰包装也很有兴趣，在售货时，有一个美国人对包装盒（丝绸绣面）很喜欢，问能不能多给他几个。还有的美国人向我多要了几张包装纸，表示这是很好的纪念品。据反映，外国顾客一般喜欢三、四寸高的秀玉小人，价格约七、八十元一个，但缺货，当前我生产的大部分是一尺多高的大玉人，每个售价一、二百元到五、六百元，这样的品种价格较贵，不利于广泛推销，而且旅客携带也不方便，值得我有关方面注意。

景泰蓝、漆器、软木风景

富有民族特色的景泰蓝、漆器、软木风景很受欢迎，美国人共买我景泰蓝 348 套，他们喜欢买立体的景泰蓝瓶。据个别美国人说，我北京的景泰蓝比香港价格贵，他们准备路过香港再买一些。这次，我销售雕漆和福建漆器不少，共达 456 套，卖出软木风景 126 个，木刻 309 个。

绒鸡、绒鸟、民族娃娃

美国人对我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多种多样的绒鸡、绒鸟以及画蛋兴趣很大，他们在民族饭店买了 306 只绒鸡、绒鸟，在友谊商店买了 317 个画蛋，还买了一些民族娃娃。

里画壶

美国人对精工细作的里画壶很感惊奇，当我售货员向他们介绍壶里的山水人物画全是艺人用笔从里面描绘时，他们认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为我精湛的艺术创作所吸引，他们这次共选购了 59 个里画壶。

地毯、台布

我国地毯早已驰名于美国，他们对我图案设计美观、质量优良的人工地毯很喜欢，这从选购 6 块地毯的过程中可以反映出来。起初他们顾虑运输地毯太不方便，因此，到我友谊商店询购地毯反复多次，此外还买了 14 块台毯，7 块靠垫，7 块台布。有一个美国记者买我台布时，他看到一块价钱 48 元的台布，他折算了一下，在美国一块同样的台布大约卖 100 元人民币。

渴望学习针灸学，纷纷购买针灸品

美国人对我针灸学很感兴趣，来京后纷纷表示要购买我针灸品，友谊商店本来不经营医疗药品，鉴于美国人有此要求，决定增设这个项目。从二月二十五日起开始出售，仅几天之内就卖了 80 个针灸人、100 多套针灸针、51 个针灸耳朵，针灸人一般选购小型人，比较便宜。针灸针许多人喜欢我盒包装的，因为这种包装可以把针扎到盒上，每个买针灸品的人，都拿走一些关于针灸学方面的外文资料，他们还向我要英文版的针灸穴图，但我没有。

踊跃选购小五金、小百货

这次，美国人对我小百货也表示有一定兴趣，一般用品都买了些，像扣子、顶针、电池、小刀、铅笔、铍金笔、小锁、扑克等等，连清凉油也买了许多。

在小百货中兴趣比较突出的是小五金和儿童玩具。我出售的小刀、剪、锁受到美国人的普遍欢迎，裁衣服的大剪刀买了 18 把，数量虽不多，买者似乎很了解我国传统的剪刀，表示欣赏。小刀卖的数量较多，其中有一种鱼状的小刀很畅销，四用小刀和小折剪、指甲刀均属畅销商品。有人一次就买了五、六盒指甲刀。另外，我小铜锁被认为物美价廉，他们买了几十把，也有一些人买了自行车锁。

在儿童玩具中，布娃娃和电动玩具（如电动汽车、电动飞机）受普遍欢迎。从第一批先遣人员开始，一般到商店都要选购。

其它小百货，如有机玻璃扣也受欢迎，罗杰斯本人就买了几十个，有的说回去给他孩子的衣服上每样扣子钉上一个，表示对这种扣子的喜欢。

此外，美国人还买我一些衣着物品，如舞衣、毛巾浴衣、绒衣，在民族饭店买了 16 件羊绒衫，反映质量很好。帽子，主要是便帽，共 326 顶，据反映对便帽的颜色他们比较喜欢黑色的。还有人买了一个雕花的大樟木箱子，价值 168 元，还有人探询我古币、古画。

总之，从这次美国人购买我商品情况看，也是逐渐发展的，由个别商品到一般商品，从低级商品到高级商品，虽然他们逗留时间不长，买东西的机会少，而在短时间内购买十多万元的商品，这说明我国丰富的商品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有的美国人感到在我国买货的机会难得，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在友谊商店问我翻译人员：“我还能得到一次机会来买货吗？”也有的美国人表示，这次是来工作的，没带那么多钱，今后旅行来时或他的朋友来时再买。同时在购买我商品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美国人对我国商品，尤其是对某些传统商品都有一定的了解，例如买瓷器时，他们就点名要青花玲珑。

（外贸部办事组调研室根据友谊公司和民族饭店提供资料整理）

【故纸堆】

文革初期重庆的抄家成果展览

庞国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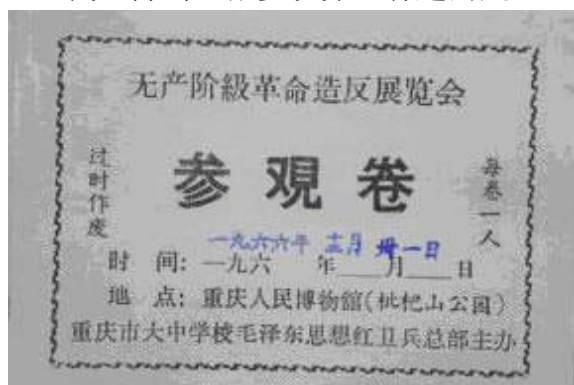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从中国首都北京刮起的“破四旧”飓风席卷全国，西南一隅的重庆也不甘落后，由官方组建的保守组织——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赤卫军，在公安机关配合下，打着“破四旧”的旗号，上街进庙，登堂入宅，大张旗鼓地对市内所有宗教场所以及“专政对象”家庭进行了查抄。

这场从1966年8月底开始的查抄活动，历时一个多月。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市共查抄“牛鬼蛇神”13160户（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编《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年8月—1997年3月）》130页）。其中，市中区“一个月内对统战对象、工商业者、‘右派分子’以及有海外关系的居民5307户进行‘抄家’，抄走财物计金额396万元。”（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市中区志》，重庆出版社1997年2月第一版，32页）；江北区“奉命指名查抄1445户的家，抄收有955户家的物资（物资变价为27万余元）。”（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江北区地方史大事记（1949.11—1992.12）》，144页）；北碚区查抄1240户，收缴各种书籍5万多册，各种画卷5000多张，砸毁神像2000多个，收缴黄金、白银140多两，银元3000多个，首饰1200多件，现金10多万元，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清退时统计，查抄各种物资总值439560万元。（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北碚地方党史大事记（1925—1993）》，1997年12月，200页）其他各区县也分别进行了查抄，有的地方至今未能见到相关统计数据。

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文革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阶段，党政领导及其御用的保守组织都感到了危机，为扭转被动处境，紧跟“革命造反”的主旋律，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利用抄家物品，在位于枇杷山的重庆市博物馆展厅，精心布置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于1966年11月下旬正式开张。

通过官方喉舌报纸和广播大张旗鼓的宣传推介，这个展览被誉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材”，一时引起轰动。按照市、区委通知精神，那些拿着单位、地段发给参观券的观众络绎不绝，在手持红彤彤语录本的“思想兵”严密监视下进行参观。其实大多数人并非是用来“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而是来看那些抄家抄出的稀罕物件，开开眼界，以后作为向别人炫耀的谈资。

我也得到一张参观券（有趣的是，上边的“券”字错印成了“卷”），参观



时间定为12月31日。谁知受到发生在大田湾体育场的“一二·四”事件冲击（保守派集会遭到造反派冲击，双方发生流血冲突），保守组织元气大伤，被造反派追打落水狗一般自顾不暇，这个“造反展览”差点被真正的造反派造反，从此闭馆歇业。我尚未来得及“一饱眼福”，就失去了参

观机会，成为遗憾。好在弄到一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内容简介》，大致弄清了这个展览展出的内容。事过多年，现已知道这个展览中的许多东西都是按照当时的“阶级斗争”思路人为布置的，比如，凡抄得的日记都称之为“反动日记”，凡家庭收支账均称为“变天账”，甚至“专政对象”家中小孩的玩具刀枪也被当作图谋变天的“杀人凶器”，民国时期的书籍画报则统统称之为“黄色书刊”，等等。

现将这个“内容简介”全文照录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

内容简介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暗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席卷全国，震动世界，荡涤着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遗留的一切污泥浊水、残渣余孽，正在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指南，在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支持下，狠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学校走上街头，进行广泛的斗、批、改，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大造旧世界的反，把旧世界杀得人仰马翻，打得落花流水。同时，我们还查抄了那些老寄生虫、吸血鬼、人民的敌人的狼窝，把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杀人武器，金银财宝掏出来示众，弄得他们狼狈不堪，威风扫地，粉碎了他们企图反革命复辟的梦想。一切革命的人民，无不他们的革命行动齐声赞扬“好得很！好得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为了歌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努力学习和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显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穷威力，同时，也为了充分揭露阶级敌人进行的文的、武的、明的、暗的种种罪恶活动，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一次生动的、深刻的阶级教育，使我们大家永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选取了查抄的部分实物，配合其他内容的图片和物件，举办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这个展览共分为四个馆：

第一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红卫兵小将的辉煌战果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林彪

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就能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林彪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本馆通过大量的图片，热情地赞扬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展，歌颂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同时，还以大量的图片和实物，展现了我们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向旧世界开火的壮阔情景。我们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旧世界，破四旧，立四新，并掌握政策，掌握原则，懂得策略，运用人民战争，准确、灵活，有力地查抄了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和一切牛鬼蛇神隐藏、转移及企图销毁的赃物罪证。展览还以大量的事实表明工农兵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红卫兵的坚强后盾。一切革命的人民无不欢呼毛泽东思想的

伟大胜利！赞扬红卫兵小将的辉煌战果！

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大造旧世界的反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我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雄的红卫兵，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造了旧世界的反。本馆就是以抄收阶级敌人的部分赃物罪证，以铁的事实有力地揭露和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全馆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彻底斗倒，斗垮，斗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将几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示众，暴露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并从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一步揭露其政治上的堕落和反动。

第二部分：

用大量的杀人凶器、变天账、金银珠宝及其他种种罪证赃物，充分揭露阶级敌人及一切牛鬼蛇神贼心不死妄图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展出的有从埋藏在地下、墙角、夹壁、房檐等地所抄出的枪支弹药、刺刀匕首、钢鞭军棍等杀人凶器；有转移地方隐藏他处而被我机智勇敢的红卫兵搜出的反动证件、印信旗帜、地契等各种变天账；有用各种狡猾手段隐藏起来而逃不出我红卫兵锐利眼睛的大量金银珠宝；还有敌人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反动日记、反动文章、记下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名单；偷送给帝国主义的情报等等，充分暴露了阶级敌人妄图复辟变天的罪恶嘴脸。

展出的还有敌人用来腐蚀人民群众，进行和平演变活动的黄色书刊、唱片、画片、封建家谱、迷信道具及其它一些赃物。

第三部分：

通过三个资本家解放前所搜刮的大量物品，从事反动活动的罪证，以及解放后继续坚持与我党和人民为敌的大量事实，充分揭露了反动资产阶级的罪恶本性，同时也使人们看到旧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的阶级对立，正是这些吸血鬼造成的。那些穷奢极欲的衣物，臭气熏天的脂粉，无一不沾满了劳动人民的血汗，深深激起我们强烈的阶级仇恨。我们就是要大造旧世界的反，一反到底，把一切牛鬼蛇神扫除干净。

第三馆：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不弄清过去的苦，就不知道今天的甜，还会把今天的甜也误认为是苦。——林彪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革命造反抄收战果统计（据不完全统计）

24

【文摘】

凉亭少年杀人事件

莫小米

按：本篇原载 2005 年 9 月 26 日《今晚报》。

乡村的太阳像往常一样升起，人们发现，在从村子到中学必经的凉亭里，一个少年用一根绳子结束了生命。

人们丝毫不怀疑他是自杀的。不是吗？少年的父亲，虽然听说有大学问，但他是从城里下放此地的“坏人”；少年的母亲，虽然长得像个演员，但农妇该会的事她啥都不会，成为田间笑料；少年自己，虽然眉清目秀，成绩领先，但入团没门儿，老师还明确告诫班上最漂亮的女孩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能与他来往。凉亭是少年上学的必经之路，凉亭里的反动标语，不是他写还是谁写的？他写了反动标语后畏罪自杀，难道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少年的尸体被草草掩埋，少年的父亲一年后伤心病故，少年的母亲改嫁他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多年以后，还有谁记得，村里曾来过这么一户人家？

有人记得。那晚村里的巡夜人，看到了骇人的一幕，他看到三个少年将一个少年活活打死，然后，把他的尸体竖起来，挂在凉亭的横梁上。

借着月光，他看清了那三个人的脸，都是村里的孩子，他们和他，是同学。他们逼他承认写标语的事，他倔强地否认，他们就不断地折磨他，直到死。

巡夜人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包庇反革命的罪名他担不起。况且非常年月，说了又能怎么样？他只能在一边悄悄地注视着那三个少年长大，成家，当干部，发财，盖楼……同时心里，默默地惦记着黄土下面，那个冤死的少年。

若是他真的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去，那么真相也就永远随之掩埋了。也许是不甘心吧，在临终前，巡夜人把事情告诉了孙子。明明白白的，三个名字。

孙子是大学毕业的都市白领，爷爷的故事让他无比惊骇。每次回家乡，看到那野草疯长的无主坟，看见那三个人，他们笑吟吟地和他打招呼时，他都会难以自持。

于是，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假如像爷爷那样永远埋在心底，我怕我会憋疯。

我说好吧，那么我们把它讲出来。我不知道像这样，算是讲出来了吗？我不知道像这样，算是讲明白了吗？

放心，我们并不想讲出那三个名字，我们只希望他们在偶尔经过少年的坟时，

能有所忏悔，我们只希望所有从那个年月走过来的人，能在心里默默地祭奠一下，那个眉清目秀的少年。

【文摘】

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陆小宝

按：本文是作者应孙怒涛校友之邀为其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所写的特约稿。已编入书中。

2012年元旦刚过，孙怒涛同学寄来一封信，信上说：“在你的敦促和鼓励下，历时四年多，终于写完了很粗的初稿。”随信而寄的，就是他的文革回忆录书稿《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厚厚一本，长达三十多万字。在给我的信中，他还调侃自己说，“我要自我表扬一下，这两年来，我很勤奋，每天都要写一点，改一点，虽然对自己写的东西越来越不满意，但写作的态度是问心无愧的。”我们这些清华校友对老孙的认真精神最是了解，我被他这几句朴素的话深深感动了：这本书稿可真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啊。

孙怒涛说，他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的“敦促和鼓励”，这是他的谦词，我受之有愧。但他这么说，也确实有一点来由。那是2008年的冬天，我回国探亲，顺便到深圳和杭州，找了蒯大富和孙怒涛，目的就是要说动他们写文革回忆录。这件事过后，我还写了两首诗，登在清华校友网上：

促写文革回忆录七律二首

其一

年末过深圳同学聚会特约蒯大富催促写文革回忆录

书生狂态共当时，各历风霜鬓有丝。
聚话席前烧烤久，散谈午后早茶迟。
戎行百日曾相斗，文革三年足反思。
纸笔催君不媚俗，要留真实后人知。

其二

杭州见孙怒涛促写反思文革文章

清华才子旧音容，对面骤然如梦中。
俗务经年人远隔，清茶一盏话相通。
昨天能鉴明天事，盛世望敲警世钟。

引玉之砖我先出，西湖杨柳待春风。

2008年那个时候，清华校友中反思文革的热潮初步形成，但有些文革时的重要人物却尚未启动。正如汲鹏在为邱心伟、原蜀育两位同学编的《清华文革大事日志》一书写的文章中说的：“反思文革这件事，从去年开始，经几个人一搅活，许多人都动起来了。……但是，有些最该动的人还没有动。”在此情形之下，我想用自己的行动再来促进一下。

促写清华文革回忆录，我为什么最先想到去找蒯大富和孙怒涛呢？几乎所有研究中国文革史的人都会知道，清华文革的群众组织分成团派和四一四两大派，团派的一把手是蒯大富，四一四派的一把手是沈如槐。2004年，沈如槐已经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为了多角度、更真实地反映文革历史，我认为蒯大富也应该写出他的书来。对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会理解。但是，对孙怒涛呢，一些不是亲历清华文革的人恐怕就不是那么了解了。

其实，要研究清华文革，孙怒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清华文革头头中，他对团、四两派都比较了解，是唯一在团派和四一四派都当过核心组成员的人物。孙怒涛很有才气，善思考，讲道理，得人心。在文革的狂热和极端的两派对立中，他的态度一直比较温和、中肯，很得一大批中间群众的拥护。如果说，蒯大富代表团派，沈如槐代表四派，那么也可以说，孙怒涛代表了许多中间派群众。在文革中，像孙怒涛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得势，甚至还常常被讥笑为“孙老机”。但是，今天我们反思文革，需要的就是这份温和、客观和真诚。这就是我动员孙怒涛出来写文革回忆录的原因。

我的那次促写文革回忆录的回国之行，是有效果的。在深圳，蒯大富答应我说，他已经有写回忆录的打算。可惜的是，他后来身体不好，未能亲自执笔，最终由他的朋友韩爱晶写了《清华蒯大富》一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在陈育延牵头组织的卢沟桥小聚会时，蒯大富带了刚刚出版的书，分发给参加聚会的两派朋友。他说，他认可韩爱晶书中所写的是历史事实，书中观点则由韩爱晶自己负责。在送我的这本书上，蒯大富签的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看了韩爱晶这本书，感到他写得确实不错。他对蒯大富比较了解，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史实，很多观点也很鲜明。但是，毕竟他没有亲历清华文革的全过程，有些叙述很难做到真切到位，有时还会让人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我想，如果他写一本书叫《北航韩爱晶》的话，一定会写得更好。

令我十分满意的是，我的杭州之行，四年后的今天，也终于结出了一个硕大的果实。这就是孙怒涛刚刚寄来，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稿。

一收到信，我急忙打开书稿，花了一天的时间，匆匆地看了一遍。我的第一印象，总觉得他的书同其他回忆文革的文章相比，有一种很独特的东西。但是，这种很独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一时间，我想抓，抓不住；想说，说不出来。三天以后，突然之间，我明白了，原来，孙怒涛书稿中这种很独特的东西，同我

久久思考的某种想法非常契合。我的这种想法，埋在脑海里，且深且久，现在经孙怒涛书稿的激发，一下子开始清晰起来。我十分兴奋，马上给孙怒涛回了一封信：我准备为他的书写一篇读后感。

孙怒涛的书稿激活了我的思想。我认为：他的书，有两大特色，要做到这两个特色，难能可贵；他的书，具一个贡献，开拓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这个课题，意义重大。

两大什么特色？这就是：第一，在内容上，着眼于自己经历的群众运动本身；第二，在态度上，内心反省式的诚恳总结。

一个什么新课题？这就是：总结文革时期的大民主实践。

群众性的民主活动应该成为文革研究的重要内容

先说孙怒涛书的第一个特色：在内容上，着眼于自己经历的群众运动本身。

我们看到，文革过去四十年，回忆文革的文章成千上万，汗牛充栋，内容十分丰富。有的是揭秘，主要是揭高层内部机密、宫廷秘闻、决策过程，以及权力之间的互相倾轧和争斗。还有的是暴恶，主要是揭发和披露文革期间各地发生的恶性事件和血腥暴行、酷刑、杀人、武斗。再有一些是谈自身遭遇和感受，主要是普通人在文革这个动乱环境中所受到的迫害、冤屈和苦难。把这些真实的史料，留给我们的后代，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看了这么多这么多后，慢慢地，不知为什么，我却常常会产生一种不足的缺憾。心里总是隐隐觉得，文革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什么内容呢？看了孙怒涛的文章，我明白了，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大多数人自己经历过的群众运动本身，也可以说是，文革期间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本身。

我们经常说，文革十年动乱，其实，群众运动，只有其中的两三年。大概的时间，从我们清华大学来说，应该是刘少奇工作组撤走，到工宣队进校。也就是，从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这一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时期。在此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的“十六条”精神，全国推行所谓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党的领导和各级政府的行政领导，都暂时停摆，改由群众自己组织的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运动中，喊得最多最响的是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以及中央文件应许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且不管决策者的最先动机是什么，也先不问社会效果最后怎么样，也先不去说高层内部的权力之间的互相倾轧，如果单从群众运动本身看，从当时的表面现象看，这个时期，或许是历史上中国民众被官方赋予“民主”和“自由”最多的时期。从孙怒涛的文章可以看到，思想上，1966年8月工作组撤离时，我们许多人都实实在在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那时候，民众自由结社集会，基本上没有问题。我们跨系跨年级，组织战斗组，自行选举群众组织领导人。言论自由，也是实实在在的，群众可以贴大字报，可以召集会议，人人可以上台参加辩论。出版呢，群众可以编写和印刷小册子，群众组织自己办报纸，也是可以的，比如当时清华井冈山报的发行量可能比许多官方报纸都大得多。

孙怒涛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积极参加者，但他当然没有资格参与高层决策，对文革理论当时他是正面理解的，事后也没有去热衷什么宫廷内幕。他平民出身，是个地地道道的江南才俊、清华大学的优秀学生，在文革前的政治环境下，却受到种种压抑，也就是他书中说的所谓“差质生”。文革中他做了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却始终保持书生本色，没有残酷迫害过什么人，也基本没有干过什么过分的坏事，更没有参加过武斗。幸好，文革后，他受到的整肃也不算太大，隐退下来做了一个他本来想做的本分的技术人员。他在书中记录下来的，主要的就是这些在文革中他自己经历过的群众运动本身。比如，怎么思想解放、怎么写大字报、怎么上台辩论、怎么组织群众，以及群众组织怎么形成、怎么成长、最后分成两大派，两派又怎么协商、怎么纷争，等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记下这些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参与人物之外，还用很大的篇幅，记下他个人的思想和心理活动。

这些内容，在我们读其他回忆文革的文章时，见到不多。感谢孙怒涛的文章，一一地真实记录下来了。这些内容，虽然发生在文革特定的畸形民主的时期，但是，无可否认，其中的有一些内容，是所有民主运动本身中都会有的内容。无疑，在我们将来在中国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难免还会碰到这些内容。所以我想，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文革中，我们所做过的其中的一小部分事情，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次初步尝试。

这里我说“文革中的一小部分事情，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次初步尝试。”我知道，对这句话，许多人是坚决反对的。我看过一本书，叫《亲历文革》，其中有一段文字，是采访南京大学一位教授对文革的看法。这位教授，参加过文革，当时还是江苏省委写作组成员，文革后，成了著名学者。他对访谈者说道：“还有一次，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我同两个从美国来的人发生争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具有伟大意义，是一次全新的民主政治的尝试。我问他们文革时你来过中国吗？他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我说，我是亲身经历过，接着就给他们上了一课。哈哈，文化大革命的丑恶只有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他们没有经历过，所以觉得好玩。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

我也“亲身经历过文革”，现在我可以说是“从美国来”的吧。我亲身体验了文革的混乱，残忍和丑恶，不会给文革冠上什么“伟大”、“全新”之类的字眼，更绝不会“哈哈”觉得文革好玩。但是，经过在国外长久的观察和反思再反思以后，现在我已经部分同意了那两位美国学者的看法：真的，从某个意义上，文革确实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次尝试。

为什么我在美国待了一阵以后，也会开始部分同意这两位美国学者的看法了呢？我想，是因为远离了国内对文革个人恩怨和情绪化的环境氛围以后，慢慢学会从更多的维度和更广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观察文革。这位教授对“民主政治尝试”的观点如此义愤，可能是他对世界民主的历史了解的还不够，而把民主政治概念化和理想化了。也许他觉得，民主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在它尝试的过程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文革中有过的那样凶残行为和丑恶现象的吧。

民主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体的政治形态。实际上，民主政治可以分成多种不同的模式。从大的说，有英国那样君主立宪式改良主义的民主，也有美国那样代议制式比较温和的民主，还有法国大革命那样全民参与的比较激烈的直接民主。从历史上看，有些民主式样，在它们的“尝试”阶段，确实出现过混乱、残忍和丑恶的现象。我们总是爱把文革说成“史无前例的浩劫”，其实，像文革这样的“浩劫”，可以说是“史不乏例”的。读过世界历史的人知道，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大革命时期，他们的动乱和血腥，并不亚于我们的文革。

有一本书，名叫《乌合之众》，是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一百多年前写的，我看了以后，感触非常深。我觉得他写的真是太真切、太生动了。我们文革群众运动中发生的许多现象，我们自己都觉得很离奇，很不可思议。他在书中一一道来，仿佛亲眼看到过一样，而且把原因剖析得头头是道，令我十分折服。比如，我一直想不通，文革中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一下子都会失去理智，仿佛都中了邪似的，变得如此疯狂？受过高等教育，这么些有知识、有教养的清华大学生，怎么会去杀人放火，将人活活打死，变得野兽般的残忍？文革中有些人的信仰、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不计名利的行为，为什么会与他们的愚蠢和残暴同时并存？勒庞先生指出，群体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个人一旦进入群体，其个人就被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群体行为，而群体行为通常具有三个特征，一个是一致性，一个是情绪化，一个是低智商。”原来，我们文革中发生的许多行为，勒庞先生早就见过，并且分析透了。勒庞先生是群众心理学的开山鼻祖，而他自己说，他的这种心理学是总结了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宗教”等等群众运动，而建立起来的。

我们国内有些人往往把文革的丑恶和凶残，完全归因于独裁、社会主义或无神论，认为只要西化了，有了民主，就可以避免文革重演，看来是将这个问题过分简单化了。

勒庞先生考察了法国大革命的民主运动，他主要指出这种类型的民主运动可能产生巨大破坏作用。必须看到，在各种民主模式中，法国大革命那样全民参与式的民主，在我们国家是最有深厚根基的。我们文革中崇尚的大民主，是这种式样的民主；而国民党崇尚的，同样也是这种式样的民主。去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有台湾学者著文指出：上世纪初，我国知识界，从国外输入两种民主思潮，法国卢梭式全体公意的民主，和英国弥尔（严复翻译成穆勒）式代议制民主。这两种民主思潮对辛亥革命的成功，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革命派支持的卢梭思想最后占了上峰。他们指出，孙中山民权主义里所讲的民主，主要是卢梭式的民主。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其实蕴含了一种全体人民参与的“全民式的民主”。延存到今天，台湾实行的民主，“总统直选”和“全民公投”等等，同美国式的民主，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台湾选举的时候，有人调侃说，不到台湾，就不知道文革还在搞。他们由台湾选举联想起文革的乱象，可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来由的。

去年台湾大选时，汲鹏正好到台湾旅游，目睹了大选场景，不禁联想到清华文革时的诸位头头。他特意给我说，“孙怒涛是个平民政治家”。最近，我又看到

郑易生同学的一封信，也把孙怒涛称为平民政治家，不过，他在前面加了一个定语：短期、业余的平民政治家。

需要指出的是，孙怒涛可能从来都想不到，有人竟会称他为“平民政治家”。他可能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他的书中写什么文革中的民主尝试。他想的只是，真实地记下自己在清华文革中的一段经历，不过由于他本人在文革中的位置，使他能够记下、也只能记下了群众组织的种种活动本身而已。但是，正因为他写得认真，写得真实，他的书就像全息摄影的底片，包含原生态的全部丰富性。人们可以多层面地解读。

我相信，不久后，人们总会看到：除了“高层揭秘”和“血腥控诉”之外，揭示群众组织的兴起、消亡、活动内容、活动方式和意义，将是文革研究中最值得深挖的一个巨大金矿。文革中的群众性民主运动，一方面呈现了它的非理性和巨大的破坏性，另一面也展示了草根平民的抗争、正义、善良和创造性。它们才是文革运动最深层次的原始动力。

拷问良知在文革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接下去，我们再来看孙怒涛书稿的第二个特色：在态度上，内心反省式的诚恳总结。

在我看到的众多文革亲历者的文章中，其对文革的态度真可谓五花八门。有谴责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或抱怨自己得到不公正境遇的，这种态度居多，也还算属正常吧。有些人呢，是掩饰，掩饰自己在文革中做过的错事和坏事。他们的文章中，从来只说别人怎么整他，却避而不谈他怎么去整别人。有的人呢，是自赞自夸。他们念念不忘自己在文革中当过什么头头，有过什么惊人举动，或者得到过最高领袖的一句什么什么话的评价。还有些人呢，是自诩正确，总想证明自己这派是对的，对方一派是错的。当然，也看到过有人在忏悔的，但这是极少数。

孙怒涛同上面所说的几种人的态度都不一样。

我们看到，在追述事实的同时，书中有大量篇幅的分析和议论。而在这些分析和议论中，且不说没有掩饰，没有自夸，没有自诩正确，就是忏悔，也只占很少的部分。他花了大量的功夫，用来检讨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他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放在道德良知的案板上，非常认真而且严格地进行解剖、分析、审查，并且重新作出评价。他审视自己的行为，真是做到了一丝不苟，毫不留情。比如，一事当头，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有过什么个人名誉利害方面的考虑，导致什么决策错误和后果，通通和盘道出。对自己这样做，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但是，相对来说，这还不算是最难的。那么，什么是最难的呢？那就是：不顾情面，不怕得罪人，真正做到秉笔直书。比如，孙怒涛在文章中，涉及到沈如槐的某些行为，以及评论周泉纓的某些观点，很可能会得罪同一个派别的生死战友；又如，他反思、追悔四一四的分裂行为，这样，肯定会引起一些本来一直相信他、拥护他的四一四基本群众的反对，可能从此失去民望。他明知后果，还是凭借良心说出自己的观点。这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设身处地，扪心自问，像他前面那样解

剖自己，我有时或许还能勉强做得到；而像他后面那样不顾情面的秉笔直书，我实在自愧不如。所以，我很理解孙怒涛的挚友王允方同学的意见：虽然不太赞成孙怒涛“成立四一四总部是最大错误”这样的说法，但不妨碍他对此书作出很高的总体评价。

我认为：这本书的价值，不是指他的史料多么丰富、多么炫人耳目，也不是指他的分析多么精当，认识多么正确，而是指他在书中展示出来的人格和良心。

前几天，有好几位同学分别给我寄来一篇网上热传的文章，题目是“文革，为什么没有人忏悔”。在问到个体忏悔问题时，作者徐友渔先生回答说：“要求人忏悔是一件很难的事。”“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罪恶元凶都不被追究的话，要叫平常人忏悔，这说不通，甚至对大多数人没有说服力。我曾经编过一本书，是文革参加者的回忆录，一个作者文章的题目就是‘我不忏悔’。他实际上主张忏悔，那些负有重大责任的党政干部事后都胡说八道，文过饰非，让我们忏悔，怎么忏悔？忏悔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道德问题。除了人的天性在感情上是非理性的，在本性上要抗拒忏悔的以外，道德问题的最重要的特点不是讲道理，而是榜样的力量最重要。如果最高负责的，该忏悔的人不忏悔，要叫别人忏悔确实很难。所以，我觉得必须有这么一点来补充，如果带头的人忏悔了，该追究的人都追究了，你再来要求一般人忏悔可能就要容易一点。”

徐先生的话讲得有几分明理，在网上博得许多人的赞同。但是，我觉得，追究文革罪恶元凶，和个体忏悔不是一回事，更不是什么前提条件。同样，那些负有重大责任的党政干部事后都胡说八道，文过饰非，也绝不是“我不忏悔”理直气壮的理由。如果个体忏悔需要这样那样的前提，那么，只会陷进一个责任链的怪圈，谁都可以期待别人先忏悔，结果谁都不忏悔。现在不正是这样吗：人人都觉得文革错误，事实上，当时也几乎人人都加入了这种错误，而事后人人都觉得没有责任，自己受迫害，自己委屈，自己不该先忏悔。互相指责，互相埋怨，就是不反省自己。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忏悔，是灵魂的自我救赎，必须出于自己本身的觉悟，别人是无法要求，更无法强迫的。你可以要求别人认罪，但无法强求别人忏悔。在精神和灵魂的层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无论事大事小，是官是民，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我们反思文革这么多年，看来，能够反思到这一点的人还不是很多。而这一点，正是民主社会的根基啊！

徐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对：“道德问题的最重要特点不是讲道理，而是榜样的力量最重要。”孙怒涛不是“文革元凶”，不是“那些负有重大责任的党政干部”，也不是在文革中杀人放火“最该忏悔的人”，但他，至少在部分清华校友眼里，确实为我们反思文革作出了一个榜样。在孙怒涛“拷问良知”的启发下，孙耘同学写了一篇读后感，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和遭遇。前几天，他把这篇文章寄给我，让我提意见。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我给他回信是这样说的：“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要是谈自己经历的事实，和自己的内心感受，没有刻意迎合某种潮流，没有攻击别人，也不糟蹋自己。”我认为，这种态度，就是良知的态度。文革中，我们同孙耘属于对立的派别，当时的观点和做法很不一样，以后的境遇

也很不同。但是，在用良知反思文革这一点上，我们是相通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孙怒涛作出的榜样的意义，不仅仅是忏悔，而且主要不是忏悔。再说了，全民反思文革，主旋律也不应该是忏悔，毕竟，在文革中做过伤天害理恶事的人是极少数。有一件事比忏悔更重要。那么，这又是什么呢？以我个人的看法，这就是；用一个普通人的良知来反思文革、审视文革和总结文革。

孙怒涛将他的书命名为“良知的拷问”。什么是良知呢？对此，孙怒涛的同乡先贤王阳明先生有过非常有名的论述。阳明先生认为，所谓良知，是天赋的为人之道，“只是个是非之心”。孙怒涛作出的榜样，就是用阳明先生所揭示的这个普通人的“是非之心”来反思文革。

据说，秦晖先生提出不同人对文革的四种判断，即体制内肯定、体制内否定、体制外肯定和体制外否定。徐友渔先生又提出“站在世界政治文明和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看待文革。”我个人认为，两位先生的这种种分法，不管体制内体制外还是普世价值等等的角度，说到底，都是以意识形态作标杆，先认定某种自以为一定正确的主义、社会制度或者时代潮流，将其作为铁定的标准来评判文革。这样的评判，很容易闹意气，很容易赶潮流，很容易走极端，很容易失真。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只要一涉及到什么体制呀、什么意识形态呀之类的话题，许多人好像一下就会失去基本的理智。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往往各执己见，完全没有讨论和辩论的气氛。我一向主张，应该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文革亲历者都来回忆文革，诉述自己亲身经历和自身的内心感受，激发自己天性的良知，来反思文革。这样的反思，既不是被某个威权政治所强迫的；不是被某个利益集团所诱导的；也不是被某些精英专家所劫持的；更不是被某种舆论媒体所裹挟的。每个人先把各自的意识形态主张放一边，为了自己的灵魂，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静心内省，不要情绪化，也不要绝对化。揭露、谴责极左和暴力是良知；揭示、坚守理想和正义也是良知。只要相信天底下确实有良知这件事，用这种方法来反思文革不是更好吗？

问题是，良知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靠不靠谱呢？徐先生在文章中就说“人的天性在感情上是非理性的，在本性上要抗拒忏悔的”。你孙怒涛受过高等教育，也许有良知，那么多普通老百姓难道也都有良知吗？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来看的话，良知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天性和本性。徐先生所说的“非理性”和“抗拒忏悔”的天性和本性，现实中确实普遍存在，没有错，但这只是灵魂蒙尘后，没有及时清除时的天性和本性。在心灵的积垢清除以后，一种真正的天性和本性才会显露出来。在王阳明那里叫良知，在佛教里叫佛性。这种真正的“天性”和“本性”，是能够辩明是非的，是愿意弃恶从善的。

有人或许会说，现在已经是讲究科学民主的现代社会了，你念念不忘地总是讲精神呀灵魂呀良知呀这一套，没有可操作性，恐怕不行吧！其实，在西方的文化中，也是很讲究精神和灵魂的净化。相对中国文化的“内省”，西方更注重“忏悔”，两者的实质意义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前面说了，西方人将个体精神的平

等和独立的观念，逐渐演化成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公民责任准则。良知这个东西，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美国宪法规定，执政者必须通过人民自由选举产生，并且有一个明文规定的任期，然后重新回到人民的自由选举中去再生。这样做的基本考虑依据就是：只要人民的整体性还保留有良知，那么这个政府就不至于长期退化为专制暴政。又如，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要特意选出 12 个没有专门法律知识的普通老百姓，让他们听取法庭辩论，互相讨论后，对被告作出最后的审判决定。这样的做法无疑就是说：一切法律制定的最初依据是普通老百姓的内心良知；一切法律执行的最终结果也必须取决于普通老百姓的内心良知。

以上看出，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民主社会是多么地看重“内省”、“忏悔”和“良知”这些东西啊！但是，生活在当今中国的人们，对这些东西，又是多么地陌生和隔膜啊！我们失去了它们，我们失去它们已经很久很久了。既然，良知是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失去了良知的社会就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从文化层面上看，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失去对良知的追求，这是文革产生和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着还要问：我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对良知追求的呢？有人说是文革开始失去的，这好像不对。文革时期，肯定是失去了，但不是开始。有人说是 1949 年开始的，这好像也不对。又有人追得再远一点，说是从共产党主导意识形态时就开始失去了。这下追溯得很远了，是不是追到根了呢？其实，还不够远，还没有追到根，而且，对责任者的认定也不全面。说起来，早在中国学术界着手构筑科学民主新文化基础的创始阶段，就发生了一些偏向。而这个偏向，是当时国共两党顶尖理论家、哲学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精英在一个战壕里共同战斗的重大成果。让我们回到 90 年前，从中国知识界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辩论说起。

1923 年 2 月 14 日，张君勱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科学能支配人生观吗？”从而引发了这场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大辩论。鉴于一战以后，在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精神危机（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科学的胜利却把人对天的信仰和对自己灵魂的信仰一扫而光），张君勱提出了一个观点：自然科学不能完全涵盖人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等等有关心理和精神范围的问题。他的许多论点主要来自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以及中国宋明王、陆学派的内省、良知等等哲学思想。张君勱好像十分心仪王阳明的“良知”说。他说，良知是罗盘，是矩尺，是量器。只要稍微刺激一下良知，人就可以发现自己是走向善和恶。而且，只要有这些轻微的警告，人就应该更严格地约束自己。张君勱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大辩论，历史上称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首先出来应战的是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随后参加辩论的有国民党理论权威吴稚晖、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学界泰斗梁启超，以及新锐著名学者胡适等等一大批精英中的精英。这场辩论历时很长，牵及的学术问题也很多，这里不想具体介绍他们各自的论点，只想简单说一下大辩论的最后结果：除了梁启超和张东荪等少数几位学者站在张君

励一边以外，吴稚晖、陈独秀和胡适等大多数学者都站在丁文江所代表的科学“赛先生”的一边。科学战胜了玄学，丁文江、吴稚晖、陈独秀和胡适都成了鼓吹科学的受人欢迎的英雄人物。

但是，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检讨一下。由于当时中国的启蒙学者们急于抛弃中国老旧传统，而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可能又有点夹生，虽然这场辩论在宣传科学上取得重大胜利，而在构筑科学民主现代社会的哲学基础的时候，还是暴露和遗留下一些问题。美国学者费侠莉在《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中，总结这场大辩论时写道：“科学赢得宣传上的胜利，如果不是理解上胜利的话。宋明理学的学术威望遭受了一次严重打击，而张君勱版本中的欧洲唯心主义成分，一直存在到后来作为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支柱，到头来声名狼藉。后来一位观察家诙谐地总计得分如下：‘利用耶稣和佛陀的神圣名字无效；对待孔子、老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很不公正；严重伤害了康德、黑格尔和柏格森；对宋代和明代的哲学家进行了致命的打击；唯独卡尔·马克思、伯特兰·罗素和约翰·杜威有幸逃脱了枪林弹雨。’”

你看看，这种横扫古今中外一切精神和思想巨匠，只留下马克思唯物主义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大辩论，结果是不是真的有点可怕呀！是不是已经留下可能产生文革的胚芽了呀！是不是已经留下改革后唯利是图、唯钱是图、唯官是图的信仰危机的胚芽了呀！

那么，通过这次大辩论，科学的观念是不是真正树立起来了呢？遗憾的是，这一点也还是打了折扣的。上面我们看到费侠莉说了这么一句话，“科学赢得宣传上的胜利，如果不是理解上胜利的话”。至少在她看来，中国学者们对科学实质意义的理解存在着偏差。这个偏差是什么呢？原来，在辩论中丁文江提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同时，又提出了“存疑的唯心论”这样一种观点。费侠莉评论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丁文江提出的‘存疑的唯心论’招致两个方面的攻击，然而理由却是站不住脚的。丁文江最重要的见地，即必须把科学主要当作一种合乎理性的方法论，却被大多数人忽视了。”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国家到处都是“科学是生产力”和“科学发展观”之类的口号，但是，如果问：科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科学的定义是什么？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学校里的科学教育最重要的应该抓什么？科学发展观怎么个发展？能够确切回答的人恐怕不多。现在许多人对科学的理解恐怕还远远到不了当年丁文江的高度。

90年前在清华大学引发的这场大辩论，中国思想界开始选择摒弃“良知”、“内省”和“忏悔”等等一套“玄学”东西。这套东西，却是现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前些年，我们经历了文革暴乱的思想危机；今天，我们正在经历改革后浮华的信仰危机。好了，90年后，现在有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科学生孙怒涛，写了一本书来反思文革，书名就叫做《良知的拷问》。这件事本身，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给我们留下许多联想和深思的空间。

我过去说过：反思文革，第一层次，要从事实上反思；第二层次，要从体制

上反思；第三层次，更深的层次，是要从文化上反思。孙怒涛不一定有意识，但他确实是从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源头上开始反思了。虽然这种反思，还刚刚开了个头，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毕竟有了线索，有了路径，下面的路就要靠大家一起来走了。

警惕以彻底否定文革为由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孙怒涛一再给同学们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批判文革，否定文革。他邀约多位同学给他的书中“文革·反思”专题写稿，要求的条件只有一个：只要否定文革就行。对于这一点，我非常理解，非常赞同。因为我们都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我们亲眼看到文革极左理论的荒谬，文革暴力的血腥，文革给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灾难后果。在学校的时候，我参加孙怒涛所在的那一派，他是头头，我是小兵。我拥护他的原因，就是他主张反极左、反暴力。

但是，看了孙怒涛的书稿以后，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看他写的内容，并不是单纯地暴露文革的荒谬和残暴，许多是他自己经历的群众运动本身；看他写作的态度，也并不是绝对的否定、指责或者忏悔，而是发自内心的诚恳反省。我突然觉得，在不知不觉之中，孙怒涛的这本书已经超出了他给自己预设的目标主题。除了“批判文革、否定文革”之外，它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反思文革、总结文革”。总结文革，主要的就是总结文革时期的群众性大民主实践。

孙怒涛这本书的主题发生了超出他本人预料的变化，绝非偶然。凭着良知来反思历史真实的亲历者，这样的变化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我们是抱着对大民主理论的正面理解投入这场运动的；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我们是在强权势力的压制和迫害下起来反抗的；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激情和我们冲破专制的勇气。文革中的平民造反派，不是每个人都是打砸抢分子；文革中平民造反派做的事，也不仅仅是血腥的武斗。文革中我们做过的一部分事情，是中国将来民主进程中必定要做的。我们的错误，有历史的原因，应该放到历史的情景中去分析考察。我们的失败，是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应该认真总结。

看了孙怒涛的书稿和拙文初稿后，郑易生同学说了一段话，很能说明孙怒涛当初的心态。他说，“有一些东西自己一直感觉到而说不出来，这次小宝的文章多少将这种感觉说出来了。我们那时候的勇敢和幼稚，其实是一种模糊而又强烈的对民主、平等和公正的诉求。不管它一厢情愿地借助给予的那一种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来表达，抽出时间语言，许多群众组织，如清华 414 中的三七战团等，其原始动机有较多追求正义、不欺负人、讲道理的价值观。这是不是可以说文革中人们行为的两重性，形式和内容、强力和自发、禁锢和自由，一一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分析起来，说一些人是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形似盲目实是自发地追求和扩大社会正义性，也不为过。这与美化自己无关，却事关对人们良知的潜在力量的认知和肯定。这点应该告诉国人。为什么我一直自我纠结，为什么我们不太

敢说，缺乏自信和底气呢？我想一个原因是，思想被一种已有的、现成的思想框架紧紧地束缚住了。”

现在，我们要大声地说：文革必须否定，但不能彻底否定，更不能简单否定。

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并不奇怪。文革的极左政治主张，有许多明显的理论漏洞。文革的许多暴乱和血腥的事实，群众留下的只是厌恶的记忆，不愿去分析总结它的合理成分。许多文革的积极参加者，事后受到整肃，不堪回首往事。目前的一些知识精英，希望通过彻底否定文革，揭示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邪恶本质，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更主要的是，某些文革中的当权者，对群众运动给予他们的冲击，不能原谅，甚至刻意报复。文革后上台的某些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恐惧文革时期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重来。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强大舆论潮流的裹挟之下，对文革应该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总结的呼声，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响应。更有甚者，有些政治集团，对不同政治派别，随手扣上“文革余孽”的大帽子进行清洗。对民间出现的反对之声，也轻易冠以“企图复辟文革”的罪名，进行打压。连老百姓的上访和起码的人权申诉，都以害怕酿成文革式群众性动乱为由，严格加以监控和防范。

我们这个国家，要启动民主这个程序，跨不过总结文革群众性大民主历史这个坎。目前，我们要警惕的是，以彻底否定文革为由来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从世界各国的民主进程看，我们可以知道：民主是人类不断追求的一种伟大理想。它的内容和方式，不是既成的、固定的和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动态的，是在探索和纠正错误中不断完善的。

民主这个概念，起始于古希腊雅典城邦，就是提倡公民直接参加管理和决策。从这个概念出发，法国的卢梭提出了民众直接参与方式的民主理念，导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大革命。显然，这种民主模式最接近民主的原始理念。但是，法国大革命发生了空前的暴乱和血腥，绝对不亚于我们的文革。比如，文革中，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受到迫害；在法国大革命中，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都是被送上断头台活活处死的。又比如，文革中，我们的许多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虐待；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现氧气的现代化学的鼻祖拉瓦锡，是被直接宣布处以死刑的。但是，法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并没有提出彻底否定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如果彻底否定了法国大革命，就不可能有今天法国以致世界各国的民主社会。

鉴于直接民主模式的缺陷，有些民主的启蒙思想家又提出了代议制民主的模式：民众定期选出自己的代理人，由他们代替人民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这种民主模式，美国是领跑者。美国的国父们，在宪法中规定了选举的程序，以后又产生政党，出现两党制，民主程序也就慢慢完善起来。现在，代议制民主式样、民众投票选举，政党轮替，成了现代民主的核心体现。有些人甚至将它认为是普世价值。其实，尽管有这些民主程序，长期以来，美国的民主存在着重大缺陷，比如种族问题、妇女问题和阶级问题，矛盾突出，有时非常尖锐。上世纪60年代，几乎与我们文革同时，美国社会也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当时美国大学的校园，反战、反叛运动风起云涌，与社会上黑人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结

合一起，有的甚至走向了政治暴力斗争。那时候的青年学生，普遍流行一种偏激的嬉皮士风气。他们脱离家庭、群居、吸毒和性解放，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行为，无疑对社会形成巨大冲击。但是，美国民众没有彻底否定他们的骚乱运动。相反，美国历史对上世纪 60 年代定位是“理想的年代、激情的年代”，并且将他们的运动定位成“民权运动”。经过民权运动的洗礼，美国模式的民主理念进一步深化，美国社会更加平等、更加进步。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美国的当权者彻底否定学生运动，就不可能有今天美国社会的民主进步局面。

再来看台湾的选举。前面我已经说过，由于国民党的民主先行者受卢梭直接民主理念的影响较深，同时台湾选举又同台湾独立派的意识形态搅混在一起，在最初几届全民直选中，确实产生过一些乱象。“不到台湾，就不知道文革还在搞”的话，也不能说是完全污蔑。我们看到，经过几年实践以后，现在台湾的选举已经变得理性多了。如果当时台湾朝野被“文革来袭”的论调吓倒，彻底否定选举的话，就不可能有台湾今天民主的成绩。

民主的进程还没有结束。它还在探索，还在深化。代议制民主，并不是最完美的民主模式。代议制民主意味着精英或政客代理民众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是否能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始终遭人质疑。加上，代议制民主模式日趋老化，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渐渐显露。精英政治、官僚政治、被资本控制和操纵的寡头政治，明目张胆地将人民边缘化。除了充当选举机器以外，人民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一民主理念得不到真实的体现。上世纪 70 年代，我们的文革中后期，美国的一些学者首先提出了“参与民主”的理论。他们主张让民众直接参加部分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来弥补代议制民主模式的不足。民主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们，做了很多推广工作。但是，成效不很理想。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参与民主”的理念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取得了长足的实质性进展。在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大潮流中，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出现了所谓“拉美化”的社会困境。为了寻找新的出路，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纷纷向左转，提出了“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口号。他们标榜：“21 世纪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有着些许区别，其中一项就是民主，而且明确是民众直接参与的民主。2007 年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在中国社科院演讲，他说：“人民有权寻找解决方案，而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人民的民主参与。我们不应该把民主等同于大选。民主的进程是多样的。”在参与民主的理念推动下，他们上下结合，成立了几万个社区委员会、几万个工会和农会组织、成千上万个经济合作社，鼓励民众绕过官僚体系，对社区政治和经济活动，积极参与决策和管理。这种参与民主的实践，方兴未艾，有些措施卓有成效，有些措施出现新的问题。

毫无疑问，无论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理论，还是拉美国家人民正在进行的实践，“参与民主”，都是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的重要部分。

“参与民主”这样的名词，也许我们不熟悉。其实，对它包含的某些理念、内容和方式，我们并不陌生。有一些，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延安时期做过的；还有一些，则明显带着文革时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印记。我们

曾经有过这么多的工会和农会、那么多的经济合作社、那么多的基层群众组织。甚至，我们曾经自信地提出过“两参一改三结合”为内容的“鞍钢宪法”。参与民主理论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并不否认，他们的思想和方法，受到过我们的启发。拉美地区的领导人毫不讳言，过去他们是跟着中国学的，现在中国变了，不管他们了，他们只能自己探索自己的道路。

我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了这种民主理念，也进行了许多这种民主理念的尝试。毛泽东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语：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文革的许多内容是为了贯彻他的这个理念。但是，在提出和实践这种民主理念的同时，我们掺杂了许多极端的思想。我们将我们认定的目标绝对化，提倡的民主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什么是专政？毛泽东说过：专政就是独裁。所以，我们的民主，势必成为独裁的民主；我们将阶级斗争绝对化，推行的民主叫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民主。什么叫革命？毛泽东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我们的民主势必成为暴乱的民主。这种独裁民主和暴乱民主，得不到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拥护。我们在民主进程中走了不少弯路，犯过不少错误。最终，文革失败了。我们的民主尝试也失败了。这当然是很遗憾的。

但是，这还不是最遗憾的。最令人遗憾的是什么呢？最遗憾的是，我们的当权者，彻底否定和改变了自己国家的民主进程。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下，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一律给予打击；文革中群众民主运动的头头，一律严加整肃；文革中人民一度已经取得的民主权利，一律予以取缔；长期摸索而得“民众参加管理”的理念一律批判；在国有企业行之有效的民主规章制度一律强制抛弃。不能不说，在某些方面，我们国家的民主理念是倒退了的。

还有最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精英，文革后分裂成互不相容的左、右两大派别。左派提出彻底肯定文革，右派提出彻底否定文革。他们互相攻讦，互相谩骂，无休无止。其实，这两个派别在思想方法上，都犯了文革时期我们这些人犯过的同样的错误。这就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各自抱定某种社会体制或意识形态模式不放，绝对化，理想化，将其视为固定模式和终极真理。不是彻底肯定，就是彻底否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没有妥协的余地 and 空间。两种极端的模式都不可能马上实现的情况下，双方无心立足实际，为民众的参与民主做点实事，剩下的只能是网上的口水战。在这种彻底否定文革和彻底肯定文革的口水战的嘈杂声浪中，世界各地的民主理念在深化、在发展，我们国家的民主进程却陷入了僵局。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美国著名评论家、《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佛里曼写的。书名是《我们曾经辉煌》，这就明显地表示，作者认为，美国正在衰落。在谈到政治方面问题时，他说，“我们政治体系陷入僵局。两党严重分歧对立，无法达成任何深入、与意识形态相悖的妥协。”而美国需要两党妥协而成的“混合政治”。他说，“民主党倾向于强调公平，共和党则擅长于建立精英政治。”其实这两者，美国都需要，不可或缺。他希望出现一种“激进中间派”。其实，佛

里曼所说美国两党对立局面，同目前中国左右两派的情况很相似。中国也需要一个混合的“激进中间派”，才能冲破目前民主进程的僵局。

说到“激进中间派”，我不由地想起孙怒涛在清华文革中扮演过的角色。孙怒涛是个“中间派”，可能算不上“激进中间派”。他在清华文革中，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起不到掌控全局的主导作用。能够掌控全局的“激进中间派”领袖，现在的美国没有出现，在中国恐怕也难。

这里还要指出，不管民主进程进行到什么程度，直接民主也好，代议制民主也好，参与式民主也好，都有一些内容是作为前提条件，共同需要的。比如，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等等。即使在文革群众性大民主的特定环境下，这些内容至少在某些有限的条件下，也是得到官方许可的。一旦失去这些民主内容，必须首先争取。

天上不会突然间掉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十全十美的民主政体。不管推行何种民主模式，直接民主也好，代议制民主也好，参与民主也好，一定都要有一个动员广大民众的过程；一定都会有广泛民众参加的对体制、政治、政策等等的争论、评论和辩论；也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基层民众组织。甚至，为了争取某种民主权利，难免会有群众抗争的行动。如果一出现这些东西，马上想起文革的群众运动，马上批判什么民粹主义，马上封网封口、取缔组织，那么，谈一切民主模式，都只能是叶公好龙而已；那么，任何一种民主模式，都无法迈开哪怕一点点的微小脚步。

民主的本意，就是民众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务。害怕民众，害怕民众组织，害怕民众说话，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很可能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用来遏制民主的借口。

彻底否定文革，很可能会彻底堵死中国启动民主的任何路径。

有人说，我们总结文革，是为了防止文革历史重演。对这种说法，我只同意一半。我认为，文革大民主的部分内容是无法防止，一定会“重演”的。我们希望防止的，是文革中发生的动乱和血腥惨剧“重演”。

文革大民主的一些内容，虽然明文禁止，今天已经在社会上“重演”。比如，文革中提倡“四大自由”的“大字报、大辩论”，文革后把“大字报”从宪法中删掉了，并被严令取缔。结果呢？大家看到，今天互联网上博客蜂起，比我们当年的大字报范围更大，传播更广。再说“大辩论”，文革后，权威人士明确规定“不争论”，结果呢，你到网上去看看，左派和右派，几乎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在那里不停地辩论着、争论着。又比如，工人的罢工权利，文革后也被从宪法中删掉了，今天中国的罢工浪潮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还有，大家都记得到，文革时期，各地都爆发过群众性组织的抗争行动。文革后，此类行动是法律禁止的，但是看看目前中国各地的反腐败、反剥削、反迫害的群众抗争运动，屡禁不止。文革的这些东西，你再说不许“重演”，它们换个什么别的形式还是在“重演”。一味靠维稳，靠禁止，肯定不会奏效。

文革大民主的还有一部分内容，将来有可能“重演”。比如，文革中各地群

众组织基本上都形成两大派，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它们看成是两党政治的雏形；文革中一度喊得最响亮的巴黎公社选举，是提倡全民选举制度。这些东西经过总结、提炼和改进，也许最后能够找到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形式来。

如前所述，文革群众运动失败，酿成惨剧；而文革民主运动的部分内容，不可遏制地必将在中国一再发生。正因如此，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认真反思总结文革经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就像参加过一次大型比赛的足球队员，不懂章法，踢得很烂很次，头破血流，损兵折将，败得惨不忍睹。现在我们这些人老了，再也踢不动了。如果由于那次惨败，足球运动就此废止禁绝，那么我们这些败军之将的最好选择，当然是隐藏伤口，以闭口息言的方式来遮羞。但是，我们知道，足球运动势必还会进行，以后有人还会组队，还会参加比赛。我们希望新的球队踢的比我们好，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这样，我们就有义务、有责任将自己参赛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供新的球队参考。所以，我们才不顾失败的羞耻和伤口的隐痛，像孙怒涛在本书中所作的这样，将当时的动作一招一式地回忆、比划出来，并且写成文章。我相信，只要是局内的有心人，一定能够看得懂我们的文章，也一定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代人的一片殷殷苦心。

总结文革时期的大民主实践是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孙怒涛把自己的书定名为《良知的拷问》。良知两个字，别具深意。对一个人，这是“良知”。许多人良知的叠加，就成为“民心”。我们赞同用良知反思文革，最终用意是赞同用普通老百姓的民心来反思文革。用普通老百姓的民心反思文革，对过去文革研究的判断，是一个突破。过去文革研究中，按秦晖先生的概括计有四种判断：体制内肯定、体制外否定、体制内否定、体制外肯定。这四种判断，要不是体制内，就是体制外；要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否定。用民心反思文革，没有这样的局限。管它什么体制，只要符合民心，可以各取其优点。对文革的判断，也不绝对化，既可以部分肯定，也可以部分否定，一切以民心为依归。我们相信良知的存在，也相信民心分辨是非的能力。因此，我们只提倡分析的态度，而不鼓励预设的立场。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上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很赞成。但对他接下去说的话，我有疑问。他说：“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很奇怪：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努力研究、吸收和综合包括中国过去和外国在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怎么能够先用“封闭僵化”和“邪路”这样肯定的断语，一棍子把所有人通通打死，自己“坚定不移”起来了呢？

习近平在十八大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讲得很好，受到全国大多数人的交口称赞。但是，我也还是有些许疑问。他说：“我们人民热爱生活，盼望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盼望着孩子能够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将人民的“盼望”和“向往”开列得很详细，但是我觉得，他有意无意地把人民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盼望”和“向往”漏掉了。其实，目前中国有很多人更“盼望”和“向往”的是：自己能够亲身参与决定自己的未来。如何正确引导、组织和帮助他们实行这种“盼望”和“向往”，这才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重要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人民“盼望”和“向往”民主。讨论中国的问题，民主这个话题是绝对绕不过去的。

讨论中国问题，还有一个话题也是绝对绕不过去的。这就是：文革。

两个绝对绕不过去的话题，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文革。如果把这两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合并成一个话题，那就成为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总结文革时期的大民主实践。这个课题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孙怒涛的书，已经将这个新课题推出前台。

孙怒涛的书名是《良知的拷问》。但是，我们知道，“良知”还不是王阳明学说的核心部分，王阳明学说中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是“致良知”。王阳明讲的“致良知”，就是：把握良知这个根本，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然后达到知行合一、经世济民的功用。

如果仅仅停留在“良知”的层面，那么，孙怒涛这本书的价值还是有限的。因为拷问良知的目的，很可能只是为了满足他个人道德的养护，或者为了他个人的灵魂救赎，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作用就不是太大。值得庆幸的是，孙怒涛的书并没有停留在拷问自己良知的层面。虽然还不是那么自觉、那么目标明确，看得出来，孙怒涛确实努力在用他的良知，内心反省式地诚恳总结文革群众性民主运动。比如，他特意地追忆了群众组织从个人、战斗组、串联会、纵队，慢慢成长，再分裂成两大派的过程，显然是想去探求群众性民主组织的发生机理。又如，他提出所谓“优质生”和“差质生”这样一套概念，其目的或许是试图寻找出诠释群众性民主运动发生的内在动力学。

下面，我从孙怒涛的书中再抽离几条出来：

1、政治道德底线。文革中，有些人不讲政治道德，唯权术是尚。比如，当时蒯大富就热衷于什么权经。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常常迷失道德底线。尼克松的水门，陈水扁的两颗子弹，就是例子。但是，孙怒涛现身说法，指出民主政治必须讲究道德底线。

2、从民众运动中产生领导。各种政治制度以不同的方式产生领导，古代有禅让、有嫡传，现代有选举、有内定。文革开始，领导群众的是一批高干子弟，搞的是“红二代”接班，有点像嫡传，也有点像内定。这样的领袖人物缺乏生命力。文革转到群众民主运动阶段后，从民众运动中产生一批群众领袖，像团派的蒯大富，四一四派的沈如槐。这种产生领袖的方法，具有最大的优越性。一般来说，这些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不但有能力、而且也是有群众基础的。孙怒涛在他的书中说到沈如槐成为四一四的一把手的大致过程，沈如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把手，主要是得到群众的认可。现在回头去看，沈如槐这个一把手也确实比孙

怒涛更合适。你想，孙怒涛连要不要把四一四从井冈山中分裂出来，是那么的犹豫和举棋不定，怎么当得了这个派的一把手呢？

3、民主政治的致胜关键是争取中间群众。虽然，孙怒涛当四一四的一把手不合适，但他对四一四的存在和发展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怒涛说，如果没有他所代表的势力，四一四肯定还是会分裂出去，但是最后能否生存下来，和向什么方向发展，就不好说了。这句话说得很客观。当时，四一四在明显得不到中央支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广大中间群众的支持，并且抵消掉太极端的政治观点，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在所有民主政治中，两派力量最后决战时所竞争的对象，都是中间派群众。最后决定成败的，不是得到多少铁杆分子（所谓‘铁票’）的拥护，而是在游移不定的中间派中能够赢得多少份额。争取中间派的过程，也是两派修正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往往双方都会向中间靠拢，克服走极端和情绪化，变得更为理性。

4、妥协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政治就是妥协政治。因为，民主讲的是共存，并不是这一派要完全吃掉另一派。要共存，一方面要善于斗争，一方面还要善于妥协。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宪法是妥协的产物，它的议会通过的所有决议案，几乎也全都是妥协的产物。

5、责任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最近我看“参与民主”理论创始人佩特曼的书，她把“责任和妥协”等等，称为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由此可见，一个缺乏公民责任心教育的民族，要实现民主政治是很困难的。

总结文革群众性民主运动，显然就不单单是“良知”，而是“致良知”了。而“致良知”，知行合一，就可能产生经世济民的社会功用。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看到，孙怒涛对总结文革群众性民主运动，还不是那么自觉，目的性还不是那么明确，有一些根本性问题尚未触及，比如：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有什么内在矛盾和缺陷，将它导致一场血腥的民族灾难。我们提出这一点，没有丝毫要苛责他的意思。相反，这恰恰说明，这是一个开拓性的工作。目前国内文革研究界，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动手做的人，还是很少很少。

的确，总结文革期间大民主实践，这是文革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写了这篇拙文的初稿以后，我曾经将它寄给几位朋友征求意见。朋友们的意见非常两极。有的人强烈坚持对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他们说：文革中，当年我们在学校里自由折腾，没有明确的行事规则，也没有清晰的自我追求目标。在整个文革中，真正的民主内核并不存在，民主的诸多要素也未显现，不能认为是一次大民主的实践。我们当年文革中的战斗组文化，怎么能够同台湾现在的政治民主相提并论？

但是，也还有较多朋友，对这个课题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和热情。有位朋友说得很动情。他说：这个课题给反思文革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即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认识我们那几年无比真诚的折腾。我从心里赞成。因为一直不甘心，甚至不放心已经付出血泪的我们这一代人将“发现价值”和“深加工”的使命这样轻易地放弃，把它完全交给后人，或者那些政治家和历史专家。

我十分感谢双方朋友的不同意见。有人热情响应，固然高兴；有人强烈反对，

至少说明这个课题能够触动人心。我今天说的“总结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实践”，绝对不是号召大家都来为文革唱赞歌，最主要的当然是总结失败教训。以上朋友所述，在整个文革中，真正的民主内核并不存在，民主的诸多因素也未显现。如果这些朋友能够把我们当年的战斗组文化同台湾今天的政治民主作一对比，详细阐明什么才是真正民主的内核和要素，这不就是我们这个课题讨论的成果了吗？

我最没有想到的，还是几位 70 后和 80 后的反应态度。他们都是我的子侄一辈，分别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 20 年，竟然对这个课题表示出极大的热情。那位 70 后，偶然看到拙文草稿，特地给我发来一封信，信中说：“陆叔叔，有幸拜读您的读后感，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文革大民主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对现今国内已发生的种种和将来的种种可能性，有相当的现实意义。非常希望能读到您这篇读后感的下篇，并期待着暑假能见到您！这是一个很新的话题，要使之成为一个课题从而能够沉淀出一些普世的价值还需要很多人，包括学术界的很长时间的努力。但是我从您的文章里读到的真诚，我想会对很多人，尤其是我们，您的晚辈们有所启发，从而参与到这件事中来。”

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期待。我期待着，有更多的文革亲历者，尤其是更多下一代的年轻人，参加这个文革研究新课题的开拓和讨论。

【文摘】

迎接周总理和外宾来厂视察访问

王光照

按：本篇节选自王光照回忆录《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十九节“聆听周总理教诲”。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1967 年金秋时节，武汉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通知沈复礼：上级决定你们厂接待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观、访问，请你们做好一切准备。第二天，曾思玉在刘海江、徐健的陪同下来到我们厂，把我和孟运通找到驻厂部队办公室，严肃认真地再次讲了这件事。曾思玉讲：给你们一个光荣的任务，接待毛主席亲自请来的珍贵客人。军区考虑到你们厂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大联合、正确对待站错队的群众方面，也走在其他单位的前面，开创了可喜的局面。研究决定，由你们来接待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参观、访问。这是你们当前的政治任务。不能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殷切期望，要认识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极大关怀，是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关怀。要把这个任务变成动力，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为党中央争光。有什么困难，尽管向刘部长讲，我让他全力配合你们。我同孟运通当面明确而坚定地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们努力做好一切准备，保证完成任务，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为毛主席争光。

接到这样一个任务，造反司令部勤务组的同志们异常振奋和激动，深深感到

光荣，都掂量出它的责任重大，决定全力以赴，抓好眼下这个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专门开会商量、讨论了几次，赵秀岳、沈复礼、孟运通、叶天彪和我等主要成员立即拿出全部精力，深入、缜密地做一切应该做的准备工作。老赵、老沈围绕着大联合、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细致而全面地准备汇报材料，我和老孟主抓面上的一应事项。我们每晚都开碰头会，汇总、检查和处理存在的问题。我与老赵是生产指挥组的核心成员，一系列生产进度方面的数字烂熟于心，完全可以做到有问必答，答必准确。群策群力，研究了外宾参观、访问的整个路径。还将办公大楼一楼供应科的大办公室腾出来，布置成周总理及谢胡等外宾的休息室，瓜子、水果、茶叶、糖果、香烟一应俱全。整个布置突出喜气洋洋的氛围。黄榕芳、冷碧莲、关孟尝他们挑选了一些五官端正的女战斗队员客串招待员，我怕她们有顾虑，闹情绪，专门给她们开小会，告诉她们是最幸福的，可以近距离跟总理、外宾接触，给她们鼓气，让她们用心做好接待工作。

事非经过不知难。接待用的中阿文字对照的几条大横幅就难住了人。阿尔巴尼亚语是很小的语种，在武汉很少人会该国文字。我派厂设计科的曾辉、王家桢等人去外单位求援、请教，他们跑了不少冤枉路，事情还是没有解决。被迫无奈，我当面向刘海江反映，请军区出面向国家外交部求援。过了两天，他专门将中阿文对照的文字送来了，解决了一大难题，他说是从北京弄到的，没少费劲。我布置倪厚彪他们依葫芦画瓢准备了几条大横幅，悬挂在办公大楼阳台及厂内主干道上空。

我们布置修建科抽调能工巧匠，在武珞路进厂前主干道路口处，抢时间，争速度，搭建一座具有中国风格的仿古牌楼。没两天功夫，一座尽显东方神韵的古典牌楼耸立在路口，十分惹眼，招人喜欢。为此我特地表扬了基建处的造反派孙振瑞，称他带人干得漂亮，为毛主席争了光。修建科的老师傅在孙振瑞的带领下，在厂内主干道两侧也搭建了几处批判专栏，由李玉合、孟运通、方承槐、梁兆正、宋文保他们赶时间，编写了一些大块批判文章，整齐地张贴在新做的专栏里。

鉴于当时混乱而复杂的形势，军区和警备司令部也是高度紧张的，深怕谢胡在武汉访问出现什么闪失，这个责任他们也担不起哩。我们群众组织也怕出事，万一出了事，会让国家形象在国际上受损。当时百万雄师有些人对中央处理七二〇事件仍然想不通，有抵触，扬言趁周总理陪外宾访问武汉之机，要拦车告状，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刘海江、徐健当面交待：这种情况绝对不能让它发生，你们应当采取防范措施。我在碰头会上提出了这个事，经讨论决定，对厂内有可能拦车告状的一些人进行集体分隔。各车间报上来一批名单，约有三四十人，其中包括江泽民。隔离的形式是将他们集中起来，在一〇一车间东边山上的废品仓库院子里学习中央文件，待周总理一行视察完毕，再随广大职工一起下班回家。就这件当年的应急防范措施，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这本书中，江泽民控诉当年造反派剥夺了他参加欢迎周总理的权利，是对他的政治迫害。试问老江：你当年在武汉，明白地知道有人放风要拦车告状。那年头不是发生过冲击东湖客舍毛主席住地的事吗？更何况周恩来呢？止不定真会有人拦车哩。我们受军区的

指示，不这样安排，又应该怎么安排呢？难道非要闹出乱子才好？2003年春天，北京开两会时，老江到湖北组参加讨论，突兀地讲他在武锅文革中被揪斗，而且几次被斗休克。为此我询问武汉热工研究所的老员工以及当时厂斗批改办公室负责人李玉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完全是子虚乌有。当年厂里决定批斗谁，必须由斗批改办公室立案，整理出案卷材料，报厂革委会讨论决定，全体委员传阅后签上自己的意见，超过半数以上的委员同意，才能开批斗会。我们压根就没见过老江的案卷材料，更谈不上签什么意见。仅仅在一次大会上临时让他上台向他质证过相关的事情，根本没有休克昏倒。过去了三十七年，突然这样编故事，有什么考虑呢？这与你们倡导的“团结起来向前看”完全脱节啦。如果说受迫害，文革初期你抛出热工所二把手卢善明，挑动群众炮轰他，让他当你的防护林、挡风墙，这与王任重抛出武大老校长李达何其相似，这未必是对人的爱护？老卢是重庆大学地下党成员，1948年曾经蹲过臭名昭著的渣滓洞，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抓“三家村”的时候，老江放出风声：别人都受到这样那样的酷刑摧残，甚至牺牲了，他为什么毫发无损地出来了？是不是出卖了同志，叛变了组织？卢善明横遭变故，从自身的伤痛中，对资反路线有了清醒的认识，很快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本来热工所的造反派对批卢就有不同的看法，为他仗义抱不平，这时都热情地帮助他转变立场，提高认识，鼓励他向资反路线进行斗争。这样，老卢在1967年5、6月份就勇敢地站出来亮相，支持革命造反派。须知5、6月份正是武汉造反派为工总翻案、同武汉军区的方向路线错误作艰苦激烈斗争的时刻，老卢挺身而出，参加革干联，同任爱生、孟夫唐、杨春庭、毛远耀这批老干部并肩战斗，确属难能可贵。后来成立厂革委会，老卢被结合进来了。

军方怕出事，走群众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交给我厂一个任务：安排我厂基干民兵在周总理到汉那天，维持傅家坡中南路口到军区大门口这片区域的社会秩序。

周总理10月8日到武汉的那天，我也去了王家墩机场，参加迎接周总理、谢胡的活动。我同很多人一起静候在跑道附近，同工总的人欢快地交谈。那天总理的专机先于谢胡的专机二十来分钟到达，军方领导人曾、刘、方、张等迎上前去问候周总理，陪总理进机场贵宾室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伫立在停机坪处，准备迎接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客人，总理不时地侧过头同曾、刘他们交谈。整个机场人山人海，除了党中央点过名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还有几十个组织的人马也擎着各自的战旗，人欢马叫，热情洋溢地等候着迎接贵宾。

当周总理与谢胡登上敞篷汽车时，各组织的人蜂拥而上，拥到车旁争着向总理、谢胡献上自己组织的袖章，有的人硬是爬上了车。霎时秩序一片混乱，那么多解放军战士奋力地维持秩序，也无济于事。看到这里，我只有挤出人群，坐厂里小车向武昌赶去。

我厂基干民兵临时指挥点设在建展馆售票室门口，这里比路面高出许多，视线好，便于瞭望和调度，何华清、熊齐塘、蔡长魁在这里指挥。他们看我赶来、连声讲来得好，来得是时候。我赶来有两层意思：我是民兵师长呀，职责所在。

第二点更重要，在工总系统人头熟，这对于协调各单位是很起作用的。今天在这里值勤的还有武重、六机部安装公司、省机械化施工公司的民兵，这些民兵中肯定有不少的“侯爷”、“王爷”，得心应手地驾驭他们，不是很简单的。这时，蔡长魁趁我不备，贴着我的耳根朝天放了一枪，枪声吓人一跳，他却满不在乎地苦笑：试试王司令的胆量。我被他搞得哭笑不得，板着脸，严肃地训斥他：胡搞也不看地方，枪声会造成人群的骚动，惹出事来该你吃不了兜着走。再敢胡来，立马下枪走人。他也知道玩笑开大了，也知道我有下他枪的权威，陪着笑脸一个劲检讨。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军人过来查问开枪的原因，我只好掩盖说是不小心走了火。老军人虎着脸斥责：也不看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就不小心呢？要千万小心，确保不出乱子。

正说着，开道的摩托车队来了，欢迎的人群跟着一阵骚动，纷纷挤向路中央，民兵和解放军战士奋力挽起手臂维持秩序。随着人群的拥动，一辆军区的吉姆轿车刹车不及，撞到了人才停下。我大声命令厂里基干民兵们抬起伤者塞进车里，又拍着车门喊：快送医院！车走了，秩序也平静了。

眨眼间，周总理和谢胡乘用的敞篷车到了，翘首以望的欢迎人群挥动手中的中阿国旗，尽力高呼“毛主席万岁！”“恩维尔·霍查万岁！”“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车队顺利地朝洪山宾馆方向去了，我悬着的心也安下了，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筹备接待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观访问的各项工作在有序地进行。我日夜都呆在原厂办公室隔壁的厂办主任办公室，协调、指挥接待准备工作，厂里各部门、各车间的进展都通过厂内电话汇总到我这里，我随时发出各种指令。全厂是一部完整的大机器，根据这些决断、安排、指令有条不紊地运转。说来也巧，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个神经中枢的指令通过口头或电话传达是飞灵的，没有畏难，没有重复，没有折扣，全部得到迅速的执行，真是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为毛主席争气，为党争光。我高度亢奋，极度疲倦，困得站着就可以睡着。有时刚合上眼，刘海江就来了，问这问那，叮嘱注意事项，询问有什么困难。他也是在曾刘首长的督促下奉命而为，从军区大院来厂，一晚上不少于5次，每次间隔大约在一小时之内。那段时间，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总算年轻，精力旺盛，挺过来了。我也知道刘海江还要跑别的群众组织，比方去新湖大、新华工、钢二司。这反映当年曾、刘及军区是十分紧张、高度重视的，职责所在，千万出不得纰漏哩。

全厂职工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昂扬的精神风貌迎接一个重大的节日——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新高涨的关键时刻亲自邀请的山鹰之国的贵客，在周总理的陪同下来厂视察访问。那天是1967年10月9日，天公作美，碧空如洗，微风习习。上午全厂几千职工集聚在厂前主干道两旁，挥动《毛主席语录》和中阿两国小国旗，唱着那年月流行的革命歌曲，等候客人的光临。从武珞路到厂前广场，彩旗飞扬，职工家属，子弟小学、子弟中学、技工学校、热工研究所的人都参加到欢迎活动中来，讲万人空巷，毫无夸张。厂造反司令部全体勤务员和干部代表肃立

在欢迎队伍前列，在为毛主席争光而执行光荣的任务，他们是沈复礼、孟运通、叶天彪、李玉合、熊齐塘、代诗玉、齐忠清、蒋丰年、何华清、杨心培、关孟尝、党委书记赵秀岳、政治部主任李松波、机动处总支书记耿德合、热工所领导干部卢善明。

上午大约十点钟，周总理、谢胡的车队从武珞路驶入厂前主干道，人们随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唱着、跳着、呼喊。我眼见第一辆插着中、阿国旗的大红旗轿车快速向生产区驶去，迅即不顾一切地追上去。驻厂部队站岗的战士知道我的身份，未加阻拦。在一〇一车间西门口，总理的座车刚刚停稳，我拉开车门，激动而兴奋地喊：总理好！总理辛苦了！周总理稳健地下车握着我的手，低声嘱咐：快与谢胡同志握手致意。我热情地走近谢胡，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侧过身，我向周总理翻开《毛主席语录》，扉页上有我的名字，以此作自我介绍，总理微笑着点头作答。这时我犯了傻，居然讲：百万雄师的人讲我是王光美的弟弟，是刘少奇伸向武汉的黑手。周总理讲：别听那些胡说八道，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捕风捉影。我连连点头。这时我注意到总理是很讲究仪表的，面颊上刚刚刮过的胡茬清晰可见，得体的中山装熨烫得挺括平滑，不显一丝皱纹，牛皮底的黑色皮鞋锃亮，那两道剑眉别具风采，深邃的目光透出别样的威严、睿智，极具亲和力。当时我内心暗暗由衷地赞叹：好一位大国总理的完美形象！

我用手势引领总理与谢胡一行进车间视察。周总理和外宾来到生产现场，热情地招手致意：感谢同志们，感谢工人阶级！我立即大声地回答：感谢毛主席的关怀！感谢周总理的关爱！按照预先的安排，首先参观了千吨水压机压锅炉封头的过程，紧接着又参观了八米卷板机的生产过程。师傅们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熟练、有序、一丝不苟地操控着庞大的生产机械，向总理和外宾展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风采。周总理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工人的劳动，当他感觉到压封头时的高温，看到飞溅的电焊弧光、高压风枪铲削汽包焊缝吹起的灰尘，嘱咐我：一定要抓好劳动保护，保障工人的身体健康。他几次扬手向工人致意，大声地问候：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在水压机旁，总理伸手握向老工人许荣生，这位从上海锅炉厂调来的老师傅激动中竟然冒出一句：总理先生好！一丝不易觉察的不悦表情显现，但很快平复。事后，我们好一顿批评老许：你就不会喊一句“毛主席万岁”？许师傅自己也后悔了好长时间。当天水压机压封头是由老班长许师傅、青年突击手钟宝发带领小组的工人操作的，谁料到出了不相干的洋相呢。

这时不经意回头，我才发现赵书记、孟运通等人才赶过来。事后他们讲：你进厂后，警卫战士立即关闭了厂大门，严禁闲杂人员入内。老赵、老沈、老孟等经过交涉，由邓副营长命令开门才进来的。我的老天，要是我反应慢半拍，跑得慢点，大门关上了，周总理一行岂不是无人接待，受到冷落？因为事先我们再三严令各车间负责人必须严守岗位，不得擅自处理参观事情，他们又不掌握全厂的情况，不可能接待好。

走出一〇一车间，路上总理询问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些情况，我逐一回答，

其中涉及一些民品、军品生产进度的数字，没见总理做什么记录。次日他在另外的场合讲话，援引我提供的数字分毫不差。就算是有人录音了，整理后请他看一遍，能记得这么清楚也是很不容易的。作为总理，日夜操心多少军国大事，在文革这样非常态的状况下就更不容易了。

趁他询问之机，我索性将厂里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解放干部、正确对待受蒙蔽群众的情况详细、具体地汇报了一番，他很专注地边听边插问，并且连连点头微笑。他不时侧向谢胡说：这就是革命解放了生产力，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谢胡边听边看，朝我微笑着点头。

在三〇三车间，我陪同总理和谢胡参观了老工人陈帮兴的技术革新——冷拔丝杆。总理靠机床太近，一旦机床运转起来，溅出的冷却液和润滑油会弄脏衣服。陈帮兴师傅请总理站远点，周总理原地不动并说：没关系，没关系。陈师傅急中生智：总理靠得太近，我不方便操作。总理后退了一小步，以商量的口气问：这样可以了吗？在场的人都为总理的言行感动得不行：这就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好总理！操作开始了，陈师傅娴熟麻利地启动机床，不一会儿一根合格的冷拔丝杆拔成了。虽说是冷拔，刚刚拔成仍然烫手，我用干净棉纱包上两端朝总理递去，总理让我给谢胡同志。谢胡笑着接过凑近仔细地看，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朝陈师傅翘起大拇指晃动了几下，弄得老陈不好意思。我从谢胡手上接过丝杆，双手递给周总理，他很专注地也看了起来。我示意老陈汇报技术革新的经过及意义，总理边看边听边点头。谢胡听翻译介绍后，伸手握向老陈。

从三〇三车间北门出来，由二〇一车间南门进去，下料工部满地都是刚下好的型钢和管子，稍不留神踏上钢管和型钢就会打滑。我使劲地扶着总理并提醒他注意安全，总理小声回答：谢谢，没问题，没关系。走过千山万水的总理依然稳健地行进着。我领着一行人在车间西跨圆剪机旁停下，向总理介绍曹全根：老曹是建厂初期从上海锅炉厂调来的，是这个车间的主任。一度站错了队，中央表态后很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主动要求到班组锻炼。老曹操作圆剪机有一套绝活，剪出来的工件又圆又好，无须修整，干活速度也快。总理听了介绍，伸手握向老曹：这样就好。主席讲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他侧向我：你们要正确对待，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接着老曹表演了圆剪绝活，只见他熟练地上料、定位、调整，一会儿功夫，一件合格的工件完成了，果然又圆又平滑。谢胡看了后又伸起了大拇指，我领着鼓掌祝贺老曹，总理也向老曹摇手致意，老曹憨厚地连连点头致谢。

总理、谢胡一行视察的压轴戏开始了。在二〇一车间东跨中门处，我送给谢胡一面文革战旗——厂内各革命群众组织袖章拼接成的一面旗帜。那是在同“二月逆流”斗争时，旗帜被军区没收了，各组织将袖章拼接起来做成的一面旗帜，象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了也不分开的旗帜。它在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岁月里，别具凝聚力。我高声地向谢胡讲：我们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祝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在恩维尔·霍查同志的领导下，取得新的伟大胜利！恩维尔·霍查万岁！

谢胡回赠给我厂一面山鹰之国的国旗，那上面的图案有山鹰，有枪和镐。我接过国旗高高举起，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中外新闻记者的照相机嘎嘎照个不停。我接着给周总理、谢胡佩戴“武汉钢工总”袖章。恰在这件事上出了洋相。给谢胡佩戴袖章，那别针是次品，怎么也穿不过去，在那么多记者的闪光灯下，我好长时间就是佩戴不好，急得不行，索性就套在衣袖上。完事了，我傻乎乎地不知所措地站着。见状，总理在我屁股上捅了两下，我醒悟过来，急忙紧紧地搂住谢胡，热烈而笨拙地把脸贴上去，一左又一右，行了所谓的贴面礼。尽管他修了面，也是我用力过大，仍然觉得很扎人。

我领着总理、谢胡朝厂办公大楼走去，邀请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总理讲：时间太紧张了，还要陪客人去别的地方参观、访问。有机会我再来。谢谢大家，你们一定要代我向大家问好。路上总理再次嘱告我：革命造反派要当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模范。一定要搞好抓革命、促生产，把斗、批、改抓紧抓好。当前尤其重要的是做好受蒙蔽群众的转化工作，你们要在“大联合”上先行一步，做出表率，促进全市、全省的大联合。听说你们在干部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党中央期望着大家，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我向总理表示：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一定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成绩回报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爱护，一定把你的指示、要求传达给全厂职工，坚决落实。

总理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客人来厂访问大约两个小时。随同总理来厂的有当年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及夫人曹轶欧，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武汉钢工总负责人朱鸿霞、李承弘，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造反派组织“珠影东方红公社”的代表，湖北、武汉新闻记者，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等。

总理的当面教诲，让我们感动、振奋，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真是任重而道远。当天下午造反司令部召开勤务组会议，由我向大家汇报和传达总理的一系列指示。讨论中一致认为要把总理的访问当作动力，将总理的指示当成行动的准则，变压力为动力，努力地去工作。根据当年传达中央精神不过夜的习惯，决定当晚召开全厂大会，把总理的指示完整地传达下去，掀起我厂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晚上在大礼堂开会，我原原本本地汇报了总理视察的全过程，详尽地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号召全厂积极行动起来，夺取新胜利。

【编读往来】

陈益南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23期《昨天》增刊上，张一哲先生论文革造反派的文章，非常精辟！是我这些年来读到的评说文革造反派之文论中，最到位的一篇。

由于官方及主流舆论的影响，三十多年来，文革造反派不仅在实际的政治处境上受到严酷的摧残，同时，在历史论著与文艺作品中的形象，也完全被妖魔化

了。因为这种妖魔化，从而致使今天的人们，无法再从种种文字记录与宣传中，清楚获知这一群体的历史真相；进而，造反派甚至成为了一个“恶”的代表，与德国纳粹冲锋队一样，嵌入到当年轻一代人的头脑之中。

对于这种有违历史真实的状况，政治家出于其权谋需要，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很多有学问的人、甚至自称是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却也在这个问题上，不分青红皂白，以官方的宣传为依据，胡乱“扳砖”，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制造历史冤案。张一哲先生在文章中，举出了一些这些年来，人们在造反派问题上的无知与偏见之事例。

对此，本人也有过若干经历。

早二年，《炎黄春秋》杂志上有篇文章，之中将文革时湖南道县残杀地富分子的血腥大惨案一事，胡乱扣到“造反派”头上。我读后给该杂志编辑部去了一封邮件，澄清那段历史的真相，并请该编辑部能对那篇文章中涉及到历史错误的地方，予以纠正。

不料，编辑部却给我转来该文作者一封气势汹汹的答复邮件，在邮件中，作者不仅不认错，相反，竟宣称：“对造反派就是不能讲一点客气！”对此，《炎黄春秋》编辑部居然也不置一词，是非不分。大概，他们认为，对“文革造反派”没有什么好说的，对也罢，错也罢，都不值得给以人权与尊重。

可见，造反派问题，的确是现今文革历史表述中的一个冤案。

这些年来，国内外对文革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对方方方面面的情况，进行了很多澄清与拨乱反正。但是，对于当年有数亿人参加或旁观的这个大历史现象——造反派问题，其研究却成果甚少。从而，使文革造反派的历史地位与形象，仍基本处于或被尘封、或被歪曲、或被妖魔化的状态之中。

现在人们都说要否定文革，但是，究竟应否定文革的什么东西？似乎却又并不清楚。其实，官方对文革的否定，重点在二处：一是对毛泽东个人后半生（晚年错误）；二就是对文革造反派。

这种对文革的否定，并不是对 1949 年建立的社会制度中的问题的否定。所以，那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三十年来，也经常随时变换形式重新出现，直至今日。

官方之所以要坚决否定文革造反派，是因为当年造反派曾将毛泽东以下的“当权派”，实质上以批“走资派”之名、都作为“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行过批斗。

所以，今天的人们，却以为否定造反派，就能防止文革的再现，完全是搞错了目标！

因此，深入对文革造反派的研究，扫除强涂在这个历史群体身上的浓墨，还历史一个真相，对于真正否定文革那些制度性的坏东西，很有必要。

何亦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我很认同张一哲先生对造反派的基本看法。造反派是思想较活跃，人格较正直的群体。毛出于政治的需要，一反 1957 年的态度，对造反派大加支持。但功成之后，则借整“五一六”为名，清算造反派。群众对造反派的理解与当权派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北大两派并非全都是造反派，公社派成员中有许多原来保校党委、保工作组，后来又保聂元梓，这与他们的惯性思维有关。季羨林被关牛棚，主要不是工宣队时期，而是聂当政时期。这一点，《牛棚杂忆》里讲得十分清楚。

杜钧福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张一哲专辑中的文章和一般历史研究论文不同，更像是个人的思想史随笔，所以有一些可议之处，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前期，当时某些单位还在掌权的造反派应对一些冤案负责。他的文章充满感情，这是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的优势，当然可能造成片面性，但远较一般微观研究深刻。他的文章的主要意义是在国内第一次明确提出新的文革研究视角，既区别于自由派也区别于左派。所选择切入点——文革和大跃进的关系也是恰当的，因为理解文革前夜中国社会结构和状况是理解文革本质的关键。

作者说他的舅父文革前在“唐山交大”，似应为唐山铁道学院。该校后迁至四川峨嵋，又迁至成都，称西南交大，从未到过贵州。

黄肇炎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23 期刊载的张一哲教授的几篇文章，都显见其功力的深厚。把大饥荒和文革联系起来，是一个独到的视角。据作者介绍，河南的文革，是造反派对该省饿死上百万人一事进行追责，而激发了群众的广泛参与。我就在想，四川饿死的人比河南多得多，为什么文革中对大饥荒很少涉及？我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河南大批饿死人发生得早，离北京近，中央对吴芝圃、路宪文等作出过处理，动静比较大，知道的人多。以此来揭露批判当权派，有中央决定作为依据，具有政治正确的立足点。而四川虽然饿死上千万的人，也有不少干部向中央反映问题的严重性，但李井泉不但没有受到处理，反而加官进爵。问题被掩盖了下来，揭露问题的干部都遭到打击报复，文革初期还被定为“黑帮”抛出批判。当时饿死人还属于极其敏感的问题，如有人贸然提出来，弄不好就会被扣上“攻击三面红旗”、“反对党的路线政策”、“宣扬今不如昔”等大帽子，导致自取灭亡。当年造反派批判李井泉的材料中，很少涉及饿死人的事，反而罗织了他“反对三面红旗”、“攻击人民公社”之类罪名。现在来看，这样的批判反而成了评功摆好了。由此可见“奉旨造反”的尴尬。看来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